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4 年 10 月 30 日第 41 期

本期目录

【文革民生专辑】

生逢乱世

- 陈仁德 极度匮乏岁月的山乡见闻
邹红斌 下矿井第一天
黄肇炎 当年在三线国防厂有关伙食的记忆
陈益南 文革期间我们单位的自行车
谢声显 我在文革中的草民生涯
何 蜀 “伟大年代”生活琐忆
阿 陀 1977 年海南农村“三同”见闻
黄章晋 我们的父辈：一个家庭的 1966～1976 日常生活史

编读往来

读者对 40 期启之专辑的感想

【文革民生专辑】说明

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宣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所谓“一斗二批三改”，简称“斗批改”），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整个十六条决定中，无一条、无一句关注民生问题。然而，“广大人民群众”都不能像“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享受“特供”，不管怎样“触及灵魂”，怎样“思想革命化”，几亿人是每天都要吃饭，要靠微薄的收入和限量的票证来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那个时代民众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几十年过去，有的

人已经淡忘，有的人刻意回避，而更多的后人则毫无所知。本刊特编发这一专辑，可供了解文革中民生状况之一斑。

【生逢乱世】

极度匮乏岁月的山乡见闻

陈仁德

按：本篇摘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1972年底，在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当下乡知青的作者被调到拔山区供销社，1973年调到显周场上的供销分社任“公社多种经营员”。四十年后，作者写成了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录。2014年6月9日作者有《自题拙著》七律一首：“如烟往事总难忘，回首青春易感伤。万里河山悲浩劫，十年风雨走穷乡。乱云深处家何在，噩梦醒时夜未央。老去陈郎头半白，无端却忆显周场。”

小学生不知糖滋味

七十年代前期我所在的地方，物资的匮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作为物资供应部门的供销社，经常为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要求而备受群众责难。

糖，当年是比稀有金属还珍贵的物品，供销社的货柜里难得一见糖的影子。农民们别说吃糖，就是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在林林总总的票证中，有一种是糖票，是供销社自己油印制作的火柴盒大小的一张小票。凡是生了小孩，就可以领取一张“婴儿糖”票，凭票可以在供销社购买一斤白糖，这是给产妇的惟一优待。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优待，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产妇手里拿着“婴儿糖”票，一次次地到供销社副食品门市来买糖，结果都是缺货，无法供应。那张薄薄的火柴盒大小的“婴儿糖”票极为宝贵，家庭主妇们会精心地保存着，生怕揉坏了，可是，在一次次奔走供销社之后，小票终于残缺不堪，但是，即使如此也还要保管着，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买到白糖。

有一次，潘经理指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对我说：“这个小孩子直到现在还没有买到‘婴儿糖’，她妈妈最近还拿着糖票来问过我，我叫她把糖票继续保存好，今后要兑现。”

我极度震惊。一个人从出生到上小学，竟然还没有买到那一斤可怜的“婴儿糖”，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

天啦！

潘经理却很平静，说：“这种情况多的是，一点不稀奇。社员们也有办法，

种甘蔗嘛。坐月子的时候把甘蔗砍下来削去皮，切成小颗粒放到沙钵里舂，舂出来的甘蔗汁就拿来喂娃儿，等于就是糖了。”

农村女人之命苦，可以想见。

石碗、草纸、尿素裤

有一次潘经理从拔山回来，传达区供销社会议精神，说：“现在农民买不到饭碗，怎么办？有办法！区里会上讲了，可以用水瓢当饭碗。”他的话音刚才落地，坐在旁边的收购门市部营业员、老志愿军战士伯有训就冷冷地说：“还有办法，用石头打嚙。”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石头打的是猪槽，喂猪用的，乡下互相调侃嬉骂的话就是说人家的碗是石头的，意思是说人家是猪。与石碗同音的十碗都成了忌讳。待客时上菜必须避开十碗这个敏感词，可以是九碗，也可以是十一碗，绝不可以用十碗菜待客，那等于侮辱客人是猪。据说还有的地方，因为主人疏忽，不小心上了十碗菜，客人当场把桌子掀翻了拂袖大骂而去。

供销社偶尔购进一批草纸都要开后门悄悄卖。那是什么草纸？粗糙得像树皮，厚厚的，提起一抖就灰尘飞扬，造纸的原料是稻草，从纸上随时可以把没有化尽的稻草疙瘩扯出来。这种草纸现在早该进博物馆了，可是那时却很稀有。不过，话说回来，使用草纸的都是公社干部之类的人，用来做手纸或者做女人的卫生纸，而农民对草纸基本没有需求。农民家庭几乎百分之百从来不使用手纸，他们代代相传的都是使用竹片。你到任何一个农民家里去，都会在猪圈旁看到一束靠在墙头做手纸用的竹片，农民们大便后就顺手在墙头折下一节竹片来刮一下屁股。农村中的妇女更恼火，根本谈不上任何卫生用品，她们发明了一种很无奈的做法，把烧过的细细的草木灰灌进一条长长的小布口袋，用来对付每月一次的烦恼。

供销社的职工是很受人羡慕的，因为他们相对说来比一般人掌握物资的机会要多，拥有某种可怜的特权。

那时已经开始引进日本尿素（化肥），人们惊奇地发现，日本尿素的包装袋是一种尼龙材料，可以用来做衣裤。长期的布票政策，已经使人们对布匹产生了一种崇拜。我的一个文友曾经讲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当年别人给他介绍一个女友，他兴致勃勃去相亲，见面后双方都满意，但是后来却告吹了。媒人告诉他，对方什么都满意，就是不满意他一米八的身高，害怕今后布票不够用。这种冷笑话现在听起来很开心，那时却伤心。

日本尿素包装袋的出现，使供销社的职工趋之若鹜，纷纷争购来做衣裤。这

就使街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由于日本尿素包装袋上印着“日本某某株式会社尿素”字样，做出的衣裤上都保留着这些清晰的字样，走在大街上，路人一看就知道是供销社的人来了。一首民谣便流传开来：

供销社的干部一大路，
穿的抖抖裤。
绸不像绸，
布不像布。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留猪证”与“刨汤肉”

肉食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我们那里城镇居民每月可以凭票供应一斤带骨的猪肉。在漫长的 30 天中，就眼巴巴地指望着那可怜的一斤肉“打牙祭”。而广大农民则无缘享受这一斤宝贵之极的猪肉，农民们辛劳终年，只有三次享受猪肉供应，一次是端午节，一次是中秋节，一次是春节，每人每次半斤。365 天里只有 1 斤半肉（市斤）。

农民吃肉只能靠养猪解决，可是，在那个贫困之极的时代，人的肚子都填不饱，以前猪吃的东西比如米糠等，都被人吃了，拿什么喂猪呢？凑凑合合地把猪喂大养肥，都没长多少肉。国家的政策是“卖一留一”，就是说，农民要喂两头猪，先将其中一头卖给国家，由食品部门发给“留猪证”，另外一头才可以留给自己宰杀。杀猪匠到农民家杀猪要先查验“留猪证”才可以奏刀。事实上走遍广大农村，都难得找到一家农民能够养两头猪，养一头猪都很难。只养一头猪怎么办？国家的办法又来了，只养一头猪就要卖“边口肉”，把一头猪从中间解剖，一边交给国家，另外一边自食。国家还规定，“硬边”上交，“软边”自食。什么叫硬边软边？杀猪后顺脊椎分解，骨头稍多的一边为硬边，反之为软边。硬边的重量大于软边，养猪的农民只能吃软边。

每年冬至后，农民开始杀猪，这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辛辛苦苦一年，终于可以杀猪过年了，闻讯赶来吃“刨汤肉”（杀猪宴）的亲友们像过节一样穿得比平常略为干净一些，坐在地坝里的板凳上。主人把杀猪匠请进屋，在院坝外挖一个大坑架上大锅，把水烧得滚烫，氤氲的热气随着寒冬的霜风四处弥漫，充溢着朴素的喜气。院子里的小孩子们一个个脸冻得红红的，手缩进破烂的袖口里，流着鼻涕围在一旁，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锅。主人把肥猪从圈里拖出来，肥猪知道

末日来临了，死活都不肯就范，拼命地挣扎着，发出声声哀嚎。主人迫不及待地揪住硕大的猪耳朵使劲往外拖，杀猪匠也上前揪住另一只耳朵一起发力。肥猪蹬住四蹄，尾巴夹到屁股里，被拖过的地方划过深深的蹄印。终于，杀猪匠把肥猪按倒在地坝边先准备好的一块大石板上，肥猪侧身露出臃肿的颈项来。杀猪匠看准时机把亮闪闪的一尺多长尖尖的杀猪刀一下从颈项刺进去，直抵心脏。猪血霎时喷涌而出，流进石板下的木盆里。肥猪发出最后的惨叫，四蹄抽搐着咽气了。

杀猪匠把刚刚咽气的肥猪的后蹄切开一个小口子，把一根拇指粗细的四尺长的铁杖——当地叫“挺杖”，插进小口子，一寸寸地往里捅，一直捅到猪耳朵部位，再把“挺杖”退出来，这样肥猪全身就贯通了。这时杀猪匠俯下身去用嘴巴对着猪后蹄那个小口子往里吹气，一股股的气就从刚才打通的通道进入肥猪的身体。杀猪匠憋足了气，额头的青筋暴起像弯曲的蚯蚓，脸涨得通红，吹一阵，换一口气再吹，竟然把一头肥猪吹得像气球似地鼓起来，四只猪蹄都直直地伸着。这时便把口子用绳子系紧，把圆滚滚的肥猪放进大锅里翻来覆去烫，一边烫，一边就飞快地用一个铁刨子褪毛，看着看着，满身是毛的肥猪就变得光生生的了。

接下来把肥猪倒挂在一棵树上，杀猪匠熟练地举起刀从尾部一分为二，然后像庖丁解牛那样，把肥猪划成一块块的，当然，要先把“硬边”留给国家。

杀猪匠分解肉块需要很好的手艺，主人要先把坐墩（屁股）肉划成若干“礼信”，即送给亲戚的礼品。每个“礼信”薄得只有两指，但从侧面看却很宽，有五指多。一头并不大的猪宰杀后除去内脏和杂物，总共可能有七八十斤肉，把“硬边”留给国家，就只剩下三四十斤，去掉“礼信”十来斤，可能还有二十多斤，这时杀猪匠把刀一挥，切下好几斤一大块，交给主人拿去做“刨汤肉”，这样，一头猪就剩不了多少了。

但凡在杀猪的那段时间，大队书记每天都要“深入”到院坝，等到“刨汤肉”香气四溢地端上桌时，书记便在上座上吃得满嘴流油。

养猪最辛苦的是家庭主妇，可是吃肉时家庭主妇按照风俗却不能上桌，她一直在灶屋里忙碌着，等到一家之主的丈夫在桌上陪客人吃完后，主妇只能喝一点残汤。我毫不怀疑，那时大量的农村家庭主妇一年到头根本没有吃过一次肉。

“怕把三两米搞脱了”

掌管肉食的食品门市经管人成了万众翘首的人物，无人不想巴结，从而偶尔买到一点点肉食。但是，内部对此有非常严格的制度，经管人一般不敢随便卖人情，而且的确也没有多少肉可在计划之外出卖。这时又有一个空间出现了，严格凭票供应的是猪肉，猪的内脏，我们那里俗称猪杂，却不在计划之列。于是猪杂

就成了非常诱人的宝贝，人们千方百计都想买一点猪杂，哪怕是一叶肝，或者一条舌。

像显周这样的小乡场，每次赶场只宰杀一头猪，又能有多少猪杂呢？

公社食堂每月吃两次肉，每次半斤，一律做成粉蒸肉，每人一碗。炊事员何良木事先要算好人数，那些人吃了，哪些人外出未归没有吃，都要记上，这是不能够轻易被剥夺的权利。吃肉时差不多职工们都到齐了，食堂里显得有些拥挤。何良木很神圣地把叠成几层的大蒸笼揭开，一时热气腾腾，肉香扑鼻。何良木的烹饪手艺不算好，但是，他做的粉蒸肉却是一流的好吃，吃进嘴里香透了，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心想慢慢受用，却不小心早就滑下肚子去了。这么多年里，我走遍天涯海角，似乎只有显周那个山沟里的炊事员何良木做的粉蒸肉最好吃。

由于肉食的极度匮乏，使得许多人为此而失去尊严，失去贞操，甚至伤风败俗。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与显周相邻的花桥公社，一个年轻女子想尽办法都买不到肉，万不得已只好跑到食品组经管人阎玉成的床上去躺着，自愿交欢。阎玉成是个北方来的老干部，年轻时不慎被炸去了右手掌，只剩下左手，人称“一把手”。他曾经是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在反右运动中被无端革职为民下放到花桥，老婆也和他离婚了。他虽然渴望女性，但他深知政治运动的残忍，而男女问题那时都是要上升到政治问题上来说的。当他面对那个躺在床上的年轻女人时，一点不敢轻举妄动，用浓浓的北方腔对那个女人说：“要割两斤肉可以。我不搞你那个灯，我怕把三两米搞脱了。”

三两米，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称，当时的粮食供应，每顿饭约折三两米。三两米搞脱，就是因此被开除公职没有了饭碗。

阎玉成我认识，和我同属拔山区供销社。若干年后，他的女儿阎兴惠嫁给了我的朋友向兴忠。阎玉成怕把三两米搞脱而拒绝女色诱惑的事情成为经典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人谈起。我也曾找向兴忠证实过确有其事。而故事的背后却发人深省，为了买一点肉，良家女子都愿意自荐枕席，何等酸辛！

米糠的致命诱惑

另外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则更让人感到沉痛。

显周公社前进大队（现在叫双塘村）有一对新婚夫妇，小伙子叫颜广（据知此人尚在，因涉及伤痛隐私，故此处用化名，读者谅之。）妻子名字不详，夫妇俩都喜欢唱歌跳舞。那时每个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表演一些简单的文艺节目。颜广夫妇都是宣传队的主力演员。由于他们比较活跃，加上前进

大队就在显周场边，处于中心地带，所以和场上一些单位的人员比较熟识。那时显周粮点（区叫粮站，公社叫粮点）会计姓张，和颜广也熟识。

农村人民公社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粮食不够吃，每年秋收后上交给国家后，自己分配的部分很少，一年口粮还不够吃半年，剩余的日子就是靠瓜菜充饥。不要说粮食，就是糠也成了奢侈品。古往今来，谁都知道糠是喂猪用的，没有人愿意吃糠。但是，时代不同了，在饥饿面前，糠也要吃。

公社的粮点掌管着糠的经营权，每当粮点加工一批大米后，便会有一批糠。这种糠是细糠，磨得很细，比一般粗糠质量好，于是便成了粮点囤积居奇的宝贝，不是关系非常好的人，莫想尝到一点糠的味道。张会计自然就成了实权人物，要想买糠，必须先打通他这一关。

颜广和张会计混熟了，就大着胆子开口买糠了。张会计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含含糊糊地支吾一阵。连着几次，颜广硬着头皮开口，结果都是一样，这让他颇有些困惑。

颜广不知道，当他在打主意买糠时，张会计却在打着他妻子的主意。他妻子新婚燕尔，青春靓丽，能歌善舞，在显周是数得出来的俏丽女人。这次，当颜广再次恳求买糠时，张会计先支吾了一阵，后来竟吞吞吐吐地把话说穿了，希望和其妻交欢。颜广当时大吃一惊，脸红到脖子上，半晌说不出话。

回到家里，颜广辗转反侧，一连几天彻夜难眠。一边是娇小的妻子，一边是诱人的细糠，他不知如何是好。在犹豫不决时，他忽然感到饥肠辘辘，一下提醒了他，饿肚子最可怕，其余都在其次。经过痛苦挣扎，他决定答应张会计的要求。

颜广鼓足了勇气，试探着对妻子说明情况，希望妻子能够配合。哪知话一出口，妻子就痛哭流涕，大骂他不是人。他也羞得满面流汗，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但是细糠毕竟对他有致命诱惑，他仍然打定主意要继续劝说妻子。

经过颜广厚颜无耻再三劝说，妻子不再争吵，只是默默地伤心流泪。颜广最后铁着心说：“你就当和我睡了一样，反正不会有人知道的。”妻子于是不再说话了。

1970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山村一片寂静。颜广的小院里闪进了一个人影，张会计来了。在竹树掩映下，颜广上前将张会计迎到了家中。此时在院坝里纳凉的山民们都已经酣然入睡，没人发现这一切。仲夏的夜晚室内依然闷热，颜广竟然在院坝里架起凉床，和张会计一起乘凉赏月。张会计不是为乘凉来的，过了一会儿就轻轻对颜广说：“已经退凉了，还是进屋去睡吧。”于是两人就回到室内。那是一间十多个平米的狭小土屋，里面并排着两张床，中间隔着一张小条桌，颜广的妻子已经在靠右一张床上睡了很久了。室内没有灯，颜广和张会

计摸索着在左边一张床睡下来，张会计睡在靠中间的位置。接下来，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天亮前，张会计走了。

第二天颜广就买到了珍贵的细糠。

这个可恶的张会计，尝到一次美味后，居然念念不忘，隔三岔五变着法子来继续贪欢。颜广想到反正都是那么回事了，多几次少几次都一样，也就没有计较。颜妻也默默忍受了。这样就难免露出马脚，终于被旁人看出了其中的蹊跷，1971年，忠县开展了“整顿财贸队伍”的运动，粮食系统属财贸队伍，工作组进驻显周粮点后，便有人暗中检举张会计的可疑行为，说他莫名其妙地经常出入颜广家，给颜广开后门卖细糠。工作组正愁找不出财贸队伍的男女关系问题，立即就将张会计隔离起来，几个回合就把问题全部搞清楚了。张会计为了争取“坦白从宽”，原原本本地交了自己的问题。那时的工作组似乎都有探究隐私的癖好，但凡遇到男女关系的案子，都恨不得把所有细节都问得淋漓尽致，而被审的一方在恐吓之下，也不得不尽吐其实，于是，发生在颜广家里的所有细节都暴露无遗。最悲哀的是，工作组一般情况下，都很乐于与人分享他们破案的成果，于是这个故事就迅速传播开来。颜妻在遭受侮辱后，又一次遭受舆论的更大侮辱，粗鲁的山民们当面耻笑她。她无脸见人上吊自杀，幸好被发现及时抢救脱险。从此，颜妻就永远没有了笑声。我到显周后常见到她，那时她刚做母亲不久，背上背着一个小孩，总是满脸的忧郁，低着头匆匆来去，当然也永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张会计在运动结束后被开除回家务农，他也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这个故事是工作组搞专案的人亲口给小学的一个老师讲了，这位老师又给我讲的，百分之百真实。

发现假肉票

严冬到来了。显周的冬天很冷，山野萧疏，寒风凛冽，水田里结起了冰凌，那些调皮的小孩小心地把冰凌揭起来，就像光滑透明的玻板。山区里的男女老少都有烤烘笼（当地叫灰笼）的习惯，寒冷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手提一个烘笼。烘笼是用山上特有的白夹竹编制的，竹编艺人把白夹竹划成很细小均匀的篾丝，精心地编织成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烘笼。烘笼里面装着一个瓦钵，盛上红红的炭灰（当地叫窑灰），就可以用来取暖了。早上在上学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学生都双手抄在一起，把烘笼提在正中，有少数粗心的孩子往往让土钵里的炭灰把衣袖点燃了。到处都是提着烘笼的人，这是当地冬日里的一大风景。

12月的一天，正是寒气逼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显周公社接到拔山区电话，称在拔山发现了伪造的肉票，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造假人可能在显周，拔山区供销社决定派出莫夫生和陈守清两名干部急赴显周公社侦破此案，并指令我协助莫陈二人。

拔山区区属单位使用的肉票是由供销社所属的拔山食品站自行印制的。那是一种用老式打字机打出蜡纸、再在油印机上用有光纸印制的票证。每张约有火柴盒大小，上面印着“拔山食品站肉票×斤”，票证下方盖着一枚长方形小红印章，印着“×月”，表示在当月有效。

就在前一天，拔山食品站在清点当天收到的肉款和肉票时忽然发现有两张面额 10 斤的肉票有伪造之嫌。经回忆，当天持该票来买肉的是一个青年农民，众所周知，农民是从不享受肉票的，这个农民的 20 斤肉票是从哪里来的呢？

食品站会计张会灼觉得有些蹊跷，戴上老花镜将肉票仔细地看了又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马上将情况报告了区供销社。区供销社领导迅速赶到，大家共同鉴定，确认是假票无疑。

很快就从卖肉的发票存根中查到了那个青年农民的姓名，也搞清楚了他的住地。他叫王用隆，家住显周公社老龙四队——小地名叫老龙嘴。

审问韩祥生

接电话不久，莫夫生和陈守清就到达显周，他们和我见面后，简单介绍了案情，说此案已经被区里定性为严重的经济犯罪，必须迅速破案。

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公社杜文书立即通知王用隆来接受调查。王用隆很快就从老龙四队赶到了公社，得知我们的意图后他很坦然地说，一年到头吃不到肉，快过年了，只好高价买 20 斤肉票来买肉过年。问他肉票是在哪里买的，他说是以三角钱一斤的价格从人和七队韩祥生手里买来的。

听到韩祥生的名字，公社就感觉情况比较复杂。韩祥生曾经是忠县三汇区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在“四清”运动中被打成坏分子撤销校长职务，开除回家管制劳动直到如今；其妻莫管静是地主分子，也被管制着。

一会儿韩祥生便被叫到了公社。这是一个穿着灰白中山服，戴着蓝布帽，双手提着“烘笼”，脸上露出一一种非常卑微的笑容的中年男人。

韩祥生被带进公社楼上的小屋里，他大概察觉出了什么，脸色变得很紧张，但仍僵硬地笑着。

问了半天肉票的事，韩祥生都装糊涂，说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莫夫生只好把王用隆叫出来，这一下韩祥生便傻了眼，愣着无言以对。

看上去韩祥生的内心极为矛盾，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过了半天才说肉票是

他在拔山场上捡的，此外就什么都不承认了。莫夫生急了，喝令他站到一个独凳上，不坦白不让下来。

莫夫生是从军队来的转业干部，在东北某部十多年，曾参与过许多经济案侦破，经验较多。他认为，假肉票不可能是韩祥生捡的，只能是他伪造的，他家里一定有印刷设备，如油印机等。现在的关键是要韩祥生承认自己是伪造者，否则找不到突破口。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又一直到深夜两点，站在独凳上的韩祥生依然一口咬定是捡的。大家不断发起新的攻势，要他坦白自己的罪行交代伪造肉票的细节，谁是同伙，油印机在哪里？

韩祥生总是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他甚至要来纸笔写下了“肉票如果是我伪造，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字据。我看了看，他写的字还颇有风骨，不愧当过小学校长。

就这样一直到天亮，大家都倦了，案情没有一点突破。

是韩国伟干的

案情的重大突破发生在早饭后。

刚吃过早饭，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到公社门口，口称看望爸爸，这小伙子脸色黑里透红，眼中流露着些许忧伤，头戴一顶灰色的人造革帽子，身穿一件补了许多补丁的蓝色中山服

原来他是韩祥生的儿子韩国伟，见父亲一夜未归放心不下，所以一大早就到公社来，他一点也没想到爸爸已经东窗事发。

韩国伟还没见到父亲就被扣了起来，一时找不到地方，莫夫生就将他带进我那间寝室里。意想不到的的是忧心忡忡的韩国伟一走进我寝室，就盯着我墙上的国画《紫藤八哥》不转眼，忘记了他此时的处境。我们叫韩国伟坐下来，向他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他把韩祥生伪造肉票的事全说出来，这个小伙子此时才如梦初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太年轻，显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一下精神就垮了，脸色变得煞白。当得知他爸爸将会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时，他犹豫了一会儿，坦然地对我们说：“把爸爸放了吧，肉票是我伪造的。”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我们立即到韩祥生的房间去，告诉他韩国伟已经招供了，要他认真坦白交待。韩祥生闻言，“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是我害了国伟，他还年轻啊！都怪我啊……”他哭着说，之所以一直不坦白，就是怕害了自己的儿子。眼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滚滚而下，那种痛苦的表情难以言喻。我不禁为之动容。

事情是这样的。

韩祥生当年任小学校长时，把韩国伟带在身边。那时韩国伟还是个几岁的小孩，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喜欢他，见他聪明伶俐，就教他写字画画。韩国伟从小就有过人的美术天赋，在图画老师的精心栽培下，画技日益见长，可惜不久韩祥生就被开除回家，韩国伟的命运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下成了狗崽子。但他对美术的兴趣依然不改，十多岁时，他创作的水彩画《黄钦水库展新容》就参加了全县的美术大展并获奖。由于父亲是“坏分子”母亲是“地主分子”，他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只好辍学在家务农。今年快过年了，家里还没有一粒米一块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拔山食品站的肉票，就忍痛花钱买回来，照着样子画，结果居然画得一模一样，足以乱真，这样，就有了后来王用隆买肉票的故事。韩国伟万万没有想到，假肉票这么快就露了馅。

不过，莫夫生并不相信韩国伟的话，他始终认为韩家暗藏有印刷设备，这么逼真的票不可能是凭手画的。

于是我们押着韩国伟去他家找印刷设备。

美术天才的悲哀

我们一行四人，陈守清走前面，韩国伟随后，莫夫生和我走最后。

当我们登上一重陡直的梯道，经过人和二队的一棵大黄桢树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韩国伟突然快步冲出队列，箭一样地向路旁的一道石崖撞去，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咚”的一声，韩国伟的脑袋撞到了石崖上，他头上那顶灰色的人造革帽子一下飞出去，掉在路旁的麦地里。韩国伟应声摔倒在路上，扭曲成一团。

我被惊呆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竟要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向坚硬的石崖！

莫夫生很快镇静下来，走上前去俯身看了看，发现韩国伟并没有死，伤势也不是很重，便大喝：“哼，装死狗！你吓哪个？”

韩国伟在地上痛苦地扭动了几下，头发乱蓬蓬的，血迹点点从头发中渗出。

莫夫生捡起那顶帽子弯下腰套在韩国伟头上，大声喊：“你不要装死狗，起来！”说着就将韩国伟强行拉了起来。韩国伟摇晃了几下，居然站稳了。

眼泪和着鲜血从韩国伟的脸上慢慢流下，他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用微弱的声音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脸回去见妈，没有脸回去见院子里的乡亲……”

“不要装死狗！走！”莫夫生推着他继续沿山路前行，而我的心却一直咚咚直跳。

绕过几道弯便到了韩国伟家。院子里的人一下围了过来，韩国伟把头垂到胸前，不敢面对任何人。韩国伟的妈妈莫管静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蓝布衣服，头上系着一条白帕子，呆呆地站在门口，她显然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被斗争了20多年的地主，虽然只有40来岁，却像个70多岁的老太婆。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一具泥偶那样默默地立在那里。在她身边是韩国伟的弟弟韩金伟，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看着陌生的不速之客。

韩国伟的家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我们从楼下找到楼上，也没找到什么印刷设备。翻来翻去，倒是找到了一些韩国伟的画稿，什么熊猫骏马之类的，都画得很好，在山乡里可称绝无仅有，连莫夫生都不断发出赞叹之声：“这小子真的画得好呢！”

在一本画册里，我们找到了几张和王用隆使用的一模一样的肉票，这无疑进一步提供了伪造肉票的铁证。

在墙角的一个瓦缸里找到了几块已经腌制好的猪肉，这无疑是用假肉票换钱买来的。

随后我们又把韩国伟带回公社，要他继续交代问题。

莫夫生总是不相信那些肉票是韩国伟徒手画出来的，在我的寝室里，他找来纸笔，要韩国伟当面“表演”。

韩国伟毫不推辞，立即接过纸笔画起来。莫夫生在一旁看着手表，不到三分钟，一张“拔山食品站肉票 10斤 十二月”的肉票就神奇地出现了，和真肉票不差丝毫，其中“十二月”也是一枚长方形的红色印章。

为了准备专案材料，接着我们又叫韩国伟一口气画了多张肉票，均是援笔一挥而就。

我不禁为这样一个美术天才悲哀，如果他不是生在地主家庭，不是生在这个知识沦丧的时代，绝对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画家的。而现在不要说做画家，就是连做一个普通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了，他只能是任人侮辱的“狗崽子”！

八两荞面和两行眼泪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莫管静来了，她是来给丈夫和儿子送饭的。她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袱，那种用大蓝布四角系在一起的大包袱，包袱里面是一个装饭的大瓦盆。

莫管静缓缓地打开包袱，将带着热气的瓦盆捧给韩国伟。韩国伟小心翼翼地揭开瓦盆，露出了一大盆白蒙蒙的萝卜片。我在一旁看了又看，里面没有一颗粮食，再睁大眼仔细看，才发现萝卜上粘着一点点糊糊，就像不小心掉进的一些不

容易察觉的灰尘。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平常的主食了吧。

这时发生了我永世难忘的一幕。韩国伟望着那些萝卜片，像凝固了一样既不说也不动，须臾，眼中滚出了豆大的泪珠，滴滴答答掉到那些萝卜片上。他大叫了一声“妈呀！”就呜呜呜地大哭起来，其凄凉哀伤之程度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

脸上毫无表情的莫管静此时也眼泪夺眶而出，不断用发黑的手背擦泪。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愣在一旁。

韩国伟一口气哭了好久，待缓过气来后，他才说：“妈，说好了队上昨天分的8两荞面留给金伟吃啊，他才5岁呀，你怎么送来给我呢？”说着又呜呜哭了起来。

这时我才明白了，原来萝卜片上粘着的像灰尘一样的那点点糊糊是荞面，那是他们一家四口昨天在生产队分到的全部粮食——8两荞面，说好了留给5岁的弟弟金伟吃的，现在却煮在萝卜片里送来了，所以韩国伟对之垂泪。

那一刻我震撼不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相信人间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场面的。这种震撼从那一刻起，像刀刻一样留在了我的心中，应该说，它已经足足震撼了我30多年，并且还将继续震撼我的整个人生。

得知此案破获，拔山区市管会（即后来的工商所）也赶来了两个干部，他们气势汹汹地说：“对这种案子，要在政治上把他们搞臭，在经济上把他们搞垮。”

其实对于韩国伟一家而言，这两点早就做到了。

随后又到韩国伟家去，把墙角瓦缸里的二三十斤肉全部没收。韩国伟家过年是绝对没有一两肉了，这个年他们会怎么过呢？

这件事最后的处理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韩氏父子并未法办。

暗夜里，边娃子暴死

山坡上的麦子一天天成熟了，一串串带着麦芒的麦穗渐渐饱满起来，起伏不平的浅丘上，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麦地染上了一层诱人的金黄色，使人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忍受了漫长春荒的饥肠辘辘的公社社员们，早就眼巴巴地指望着麦子收割后饱餐一顿。农村的节日很多，但是真正喜庆的节日却是收获粮食的时候，一是小春，一是大春。所谓小春，就是指小麦，大春，就是水稻。每到这时，再贫困的山民都要让肚子敞开吃几天。

离显周场只有一里路的人和二队这天开镰割麦子，金灿灿的麦子收割回来后，迫不及待的社员们守在院坝里等着生产队分配。保管员叫两个年轻人抬起长长的木秤，一家一家地过秤，到最后已经是摸天黑地。提着为数不多的麦子高高兴兴回到家里的社员们，马上吱吱嘎嘎推起石磨，把麦子磨成麦面下锅，最幸福

的时刻到来了。

人和二队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小伙子叫张义标，小名边娃子，长得虎头虎脑壮实实，浑身透着活力。这天晚上，边娃子一家匆匆地磨好了麦面，觉得第一天尝新应该做好一点，就用家中存放了很久的难得一用的菜油来烙麦粑。边娃子的妈妈把柴火烧旺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从角落里摸出沾满了尘土的菜油瓶，拧开瓶盖把菜油倒进锅里，再把和好的麦面依次放进锅里，只听见铁锅里发出吱吱的声音。边娃子和几个弟妹都围着灶台，眼睛直直地盯着锅里。

这时忽然从锅底冒出一股难闻的臭味，臭得人头昏目眩直想呕吐。

这是怎么啦？

万万想不到，边娃子的妈妈取菜油时，把角落里的一个农药瓶当成了菜油瓶，现在锅里吱吱响着的是农药，农药发出的怪异之极的臭味一时充满了整个灶屋。

这时锅里的麦粑也差不多烙好了，其中锅底那一块最大。

怎么办？

生产队张队长闻讯赶来了，张队长眼睛炯炯有神，皮肤黝黑，早年曾经上过朝鲜战场，算生产队里见过世面的人。张队长走到锅前看了看，说：“农药没有啥子不得了，用肥皂水消毒就行，供销社潘经理讲过的。”他说的是供销社宣传资料上的话，使用农药后要用肥皂洗手退去残留的毒药。

边娃子盯着锅底那块最大的麦粑，实在舍不得丢掉。听了张队长的话，就找来肥皂，将那块麦粑拧起来洗了一遍。那块麦粑沉甸甸厚墩墩的，拿在手里很是爱人。

边娃子把麦粑凑到嘴边，好大一股难闻的气味，由于是在锅底，这块麦粑渗透的农药最多。他犹豫再三，想丢掉，最终还是舍不得。饥饿已极的他，实在无法拒绝麦粑的诱惑，反正已用肥皂洗过了，就吃吧。

在莫名其妙的快感中，边娃子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整块麦粑。

不一会，边娃子就脸色发白转青，肚子暴痛，痛得抱着肚子弯下腰去大声惨叫，接着就倒下去直打滚。家里的人被吓坏了，立即把他抬到显周诊所来。诊所丁明文医生披衣起床为他急诊，这时边娃子已经不再动弹，只是脸上冒着豆大的汗珠，眼睛大大睁着。巴掌大的显周场一会就传开了这件事。我也跑到诊所去看。我去时丁明文医生刚停止抢救，宣布边娃子已经死亡。边娃子的尸体静静地停在地上，身体扭曲，脸色狰狞得可怕。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呆若木鸡，没有言语，没有眼泪，只是眼睛无神地盯着地上。很明显地看得出，边娃子快做爸爸了，他妻子的肚子已经隆起，薄薄的衣服已经掩饰不住新生命的迹象。

一个活鲜鲜的生命在转眼之间就消逝了，夺去宝贵生命的是一块不到二两的麦粑。边娃子舍不得丢掉浸透了农药的麦粑，而丢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是发生在我眼前的最为惨痛的悲剧之一。在那个“到处莺歌燕舞”的时代，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在暗夜里。近 40 年来，除了我在这里提到，恐怕没有人会想起他。

边娃子的妻子在他死后不久就把肚子里的胎儿打掉改嫁到了人和一队，离我的住房很近，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上坡干活，整个表情依然非常木讷。每当看到她，我就会想起那个暗夜里，她眼睛无神地盯着地上的丈夫遗体。

【生逢乱世】

下矿井第一天

邹红斌

按：本篇原载《中国知青通讯》总第八期，原题为《从知青到矿工》，现标题是另拟的，这次发表时作者略有修订。

作者邹红斌，原重庆市第十三中学（现已恢复兼善中学旧名）高 66 级学生，1969 年 1 月下乡，1972 年 1 月回城，当过矿工、宣传干事、基建科长、建筑公司经理、工程师、酒家经理。现为重庆北碚区知青联谊会会长、重庆知青联谊会副会长。

下乡的第三个年头，国家出台了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的政策。受益于这个政策，1972 年 1 月 1 号我回到北碚，来到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嘉陵煤矿（原名复兴隆煤矿）。报到的时候，劳资科科长问我愿不愿意去矿子弟校当老师。虽然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但我对矿工井下的工作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而且，那时的我依旧是一个满怀革命理想热情的青年，所以，听了科长的问话，我完全没有往脑子里过一过，就干脆地回答：我不去，我要到生产第一线去采煤！科长继续关怀地说：采煤很苦哟。我充满激情地回答：不怕！

当然，在我内心深处还打着一把小算盘：采煤工每月有 53 斤口粮，教书才 26 斤。回顾一下自己二十几年不算长也不算太短的历程，似乎这辈子都没敞开肚子吃过饱饭。下井有那么多口粮，总算可以有饱饭吃了啊！

这是一个百年老矿，因煤质好而闻名，但由于煤层薄，生产工具却相当落后，跟小煤窑一样，井下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挖煤镐，还配有鑿子、手锤、钢钎等石工工具。工人也没有配备最基本的安全保护——安全帽（在那样的井下也不适用），矿工每年每人发两块宽 30 公分、长 2 米的白布，叫做窑帕，用来包在头上插上矿灯替代安全帽，每天洗澡时洗干净轮流着用。澡堂是在离井口不远的一排夹墙瓦房里，里面安着三十几个约一米大小的石脚盆，听老工人说那些石脚盆最老的

有六、七十年了，澡堂中间放了两个铁桶烤火炉，冬天 24 小时燃着火，用以洗澡时取暖，不当班的工人也常常站在中间烤火。

所谓矿灯，不过是用几片铅板装在一个长 12 公分、宽 5 公分、高 15 公分的土瓷瓶里，充电时里面灌满俗称“镪水”的稀盐酸，充足电后倒掉“镪水”，再把电瓶背在贴近腰部的地方。有时“镪水”没倒干净，流出来不但将窑裤烧烂，腰部的皮肉也被烧得火辣辣的，疼痛难熬。矿灯的照明部分是用手电筒灯头做的，插入头上的窑帕，一柱光亮让矿工在漆黑的工作面里勉强可以驱走被埋在坟墓里的感觉。这是当年井下最原始的矿灯。

嘉陵煤矿分为一矿、二矿，分别在北碚区的明家沟和合川的草街子，家属区分别在大沱口和白羊背，到矿上上班都要走泥泞小路翻山越岭走一个多小时，旧社会下井挖煤叫“走厂”，就是因为工作和住地很远而得名吧？这时的家属职工宿舍还都是棚户区，一家五、六口人挤住在十几平方的独房里。

我被分到一矿采煤三班，这个班每年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因此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班长叫唐元兴，老党员，是父亲的工友，也快退休了。

上班第一天，我 6 点起床，走到矿上已是 7 点多钟了。吃了早饭，穿上工作服，头上包好了窑帕，背上电瓶，将电筒头插在窑帕上。全副武装好后，颇有些兴奋。唐师傅见了却对我说：你不要穿工作服，没用，穿短裤就行了。我听了心里很是不屑，想，我一个有文化的现代青年工人，竟然叫我赤身裸体干活，我才不干呢。跟随他走到井口，他又叮嘱我：你要注意看脚下，又要注意看有没有煤车。要早点让车，安全最重要。

井下一片漆黑，只有我们头上那一点点亮光。脚下有两根钢轨伸向黑暗深处，钢轨中间是间距不等的枕木。左边的墙上挂着数根电缆线，右边是一条乱石水沟，沟里一股碗口粗的水不知疲倦地向井口奔去。矿井的井壁没有任何处理，形状怪异诡谲的岩石突兀着，到处是裂缝，头顶上吊着的好似随时都会掉下来，真是步步惊心。我随师傅急速走了 40 分钟，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往左到工作面，往右是大巷，还在打掘进，开拓更多的采煤工作面。

我们从左边进去，到了一个绞车场。绞车轨道有 50 米长，45 度的陡坡，上面的煤通过绞车运到下面平洞再送出井口。我们顺着绞车边的人行道往上，就像是上了二楼，这又是一个平洞，地面铺着钢轨，煤车被人工推着沿轨道前行，我们要时不时地给煤车让道。在这个平洞里走了 10 分钟左右，又到了一个路口，这也是一个 60 度的陡坡，洞口只有 80 公分高，我们一行人猫着腰，手脚并用爬着前进。爬了大约 5 分钟，又是一个岔路口，师傅说左边是一班、二班，我们三班、四班、五班在右边。顺右边低矮的洞爬了约 7 分钟，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煤仓。所谓煤仓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岩石大漏斗，下口有铁门，煤斗车在第二平洞就能将

煤接到煤车里运到绞车场。这里有个老工人守着，专职给生产班组记数，产了多少吨煤由他记录后出井报给生产科。

第一次由煤仓到工作面的15分钟，我终生难忘。这个近60米的通道，高只有60公分，宽不足120公分，人在里面只能爬，背还不能弓，腹部要紧贴着地面。地面有两条移动式钢轨。我们用竹编的爬耳（是一个长110公分，宽80公分，高25公分的竹筐。下面有个木架安着四个小轮，总高55公分）在轨道上将工作面的煤运到煤仓。

拉爬耳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不需师傅带着啥的，我就让其他人先走，自己走最后。师傅说：你慢慢来，不要怕，小心挂伤背。

伸手不见五指的洞里，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努力地向前爬，在这个极其狭窄的空间里，我感觉到了整座山的挤压，几乎要窒息了。身下是冰冷的钢轨，周围是嶙峋的怪石，死寂的洞里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和时不时垮落的石渣发出的沙沙声响。也不知道那些岩石会不会突然垮塌下来？要是那样，我就真的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黑暗中，恐怖和绝望一阵阵袭来，我简直有一种肠子都悔青了的感觉。劳资科长让我去当老师，我竟然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我真是吃错药了！为了多27斤口粮，值吗？原来听人说：拉船的人是死了没有埋，挖煤炭的人是埋了没有死。这句话的含意，而今眼目下是真正领教了。

我像螃蟹一样奋力向前爬，只能奋力向前爬，向前才是生的希望。也不知是因为用力还是因为恐惧，我全身大汗淋漓，额头上的汗水一个劲地往眼睛里灌，厚实的劳动布工作服就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完全湿透了，穿在身上犹如一道道麻绳紧紧地缠着，动弹都困难。这时我才有了要把工作服脱下来的愿望，赤身裸体的羞耻感随之灰飞烟灭，但是已经没有那个可能了，因为场地太窄。无情的事实终于让我明白了师傅说穿工作服没用的道理。

终于来到采煤工作面。师傅见我气喘吁吁的，就对我说：你找个地方坐一下，这会儿没有事做。坐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才留心观察了一下采煤工作面的情况。工作面是一条几百米长的煤层，采煤工一人负责5米长的工作面。工作面只有一米高，最下面10公分是煤，上面是30公分煤矸石，再上面又是一层30公分的煤……总共三层煤，两层煤矸石，就像夹心饼干。工人用挖煤镐将最下面那层煤挖掉，直到5米长的工作面挖通，深度在40至50公分，这个工作量挖下来就是8小时了。挖煤从最下层开始，一般都只能躺着挖，很多工人都是赤身裸体，穿工作服一方面热，不方便操作；一方面容易磨损。老工人们下井一般是连内裤都不穿的，只把窑帕围在腰间（像超短裙那样），进去后再将窑帕系到头上，下班时又将头上的窑帕取下来围在腰上就出井了。采煤工将第一层煤掏空后就开

始出煤了，工人就用鑿子，钢钎、手锤将煤矸石打下来，大的数百斤，小块的也有几十斤重，一块一块用钢钎和用手搬到被采空的工作面后边，像修大寨梯田堡坎似的码放整齐，一直码到顶端，叫天坪，矸石将天坪顶住以免采空区垮下来。堡坎与工作面之间大约有两米，就是采煤工作面。采煤工作面不能太宽，宽了天坪托不住就会垮下来，叫冒顶，会死人的。当知青的时候，只以为干农活是天底下最艰苦的劳动，来到煤矿工作了还不到一天，就深刻体会到了，没有最艰苦只有更艰苦。矿工在井下全身赤裸跟猿人没什么区别，这还不算，矿工劳动的体力支出也远远超过农活的体力支出啊！

煤矸石打掉后就可以打煤炭了。师傅们没用多少力就将煤层打下来了。在挖煤和打矸石时，还要经常敲打顶板和旁边的煤层，看有没有空响，天坪有空响马上就要打一根木料衬子将上面石头顶住，才能保证工作面安全。有的衬子经不住上面石头的巨大压力，被压成像麻一样的木丝。如果这样，就必须在旁边加一根木衬才行，以防喷槽垮塌和冒顶，这些都是要命的事故。

12点钟，保健饭送来了。所谓保健饭，其实就是半斤面粉做的一个大馒头。我们煤矿的大馒头远近闻名，做得特别好。矿工每人一个，加上白开水，也无法洗手，就这样拿着就吃，大家边吃边吹牛，吃得津津有味。第一次上班第一次下井也是第一次吃这种伙食，肚子早就饿了，半斤面的馒头几口就滑进了肚子，还喝了很多水。饭后休息了约十分钟，就又开始工作了。

煤层打下来后，就轮到我們拉爬耳。我用铁皮撮箕将煤块撮到爬耳里，装满一筐后，沿着小轨道运到煤仓去，这次我有了一点经验，手爬在爬耳后方边沿，人只要贴着地面推着小车前进就行了。往返20几次，终于完成了全天的任务。

下班出井已是6点钟了，洗了澡回到家已快8点了。这就是矿工一天的工作。

这是个年产10万吨的市属小煤矿，两个井口有2000多工人，井下采煤工只有近800人。那时经常放卫星，是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能完成要完成，不能完成也要完成。为了完成任务，工人们除早上工晚收工之外，还不得不将煤矸石一起装到爬耳里，由我推去煤仓。估计大家都这样干，也就查不出是哪个班干的了。放卫星多出来的产量，其实都是煤矸石。有一次，重庆601棉织厂来接我们矿的职工去参观，我见到他们厂的煤坪里有堆积如山的煤矸石，心里不免惭愧，想，这里面也有我的杰作。

42年如白驹过隙。还记得当年，我把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22元（18元工资，4元下井补贴）全部交到母亲手里时，母亲很高兴，说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拿工资的了。其实当年，煤矿到农村招农民当矿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的农民被招来后，要不了多久就跑回去了），但我们知青要回城，却不能不以接父辈班的方式到煤矿当矿工。离开农村时看到仍然留在农村的那些知青，心里颇

有优越感和自豪感，而真正成为了一名矿工以后才知晓，下井的矿工比农民苦多了。不过，当我第一次把工资交到母亲手里，看见母亲开心得把脸都笑成了一朵花，那种自豪的感觉就又回到了心里。

【生逢乱世】

当年在三线国防厂有关伙食的记忆

黄肇炎

我是重庆大学 1967 级毕业生，由于文革的原因，到 1969 年 1 月才分配到云南燃料一厂工作。这是一家隶属于云南省国防工办的，生产雷管、底火和拉火管的三线国防厂。按照毛泽东“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和林彪“靠山，分散，进洞”的要求，工厂远离城市，建在陆良县的深山沟里，和附近的农村都隔着好几公里。厂里除了有一间很简陋的小卖铺卖品种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外，没有任何社会服务。什么餐馆、小吃店等都是没有的，公家不办，当时也不准私人开。

我那时还是单身职工，只能在食堂里吃饭。大食堂是一座砖柱土基（坯）墙瓦顶的建筑，有 30 多米长 10 来米宽，兼用作开大会的会场。北头隔出一大间作厨房，隔墙上开了 3 个一米见方的窗口作打饭用。食堂另一头垫高约一米作开会的主席台，两侧有几步台阶供人上下。食堂里没有桌凳，空荡荡的。人们打好饭都是一边吃一边走着离开。

工厂那时还在基建阶段，粮食定量比较高，叫做“吃基建定量”。除了锻工、铸工、锅炉工每月是 45 斤外，其余不分干部工人，不分男女都是 42 斤。大多数人都吃不完，就连我这样饭量较大的人都可以有结余。吃饱是没问题，问题在于吃不好。

早餐基本上天天卖稀饭，下饭菜是豆腐乳，云南叫做“卤腐”。还有白糖，云南产糖，白糖比较多。都是要收饭菜票的。

厂里有许多人不吃早餐，食堂卖稀饭时打饭的人不多。我问过厂里的青工为什么？他们说：“那个稀饭，不吃不饿，吃了倒饿！”我一想，也有点道理。经过一夜的消化，胃已完全空了，即使不吃早餐，感觉有些麻木，好像不太饿。而稀饭比较清薄，到 10 点 11 点钟已经消化完了，饿的感觉确实更明显。但我是要吃早餐的。除了偶然起床晚了，来不及打饭以外。早餐偶然地卖馒头，这时职工们就来劲了。只见他们用尼龙网兜，一买就是一兜，有几公斤吧？山沟里没有什么糕点，用冷馒头蘸白糖吃，有一点像糕点的味道，这是他们喜欢馒头的原因。

食堂早餐大约一个月卖一次米线，这时就热闹了。人们头天就会互相转告：“明天早上卖米线！”连那些平时不来打饭的家属也都来了，拿着铝锅饭盆，排

上数十人的队。米线有剁肉加酸腌菜炒的“帽子”，味道不错。对于当年山沟里的人来说，这已是一种难得的美味，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来吃。如果起床晚了，那就买不上了。所以遇到卖米线，我这样的人可能连稀饭都吃不上。

中、晚餐是大米饭。陆良县坝子大，水田多，不吃杂粮，都是吃大米饭。打饭很简便：排队，把饭票交给炊事员，说要几两饭。炊事员手拿两个镀锌铁皮做的上大下小圆台形的饭瓢，大的堆尖是5两，刮平是4两。小的堆尖是3两，刮平是2两。那时1两饭是2分钱。陆良大米带点枣红的颜色，品种不是太好。饭里碎石较多，经常会被细小的石子儿磕着牙，要吐半天。

菜肴是素菜，每餐只有一种菜。山沟里的蔬菜品种极少，食堂里基本上只有白菜、苦菜、萝卜，一年到头就是这三种。我在厂食堂吃了近十年饭，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的这三样菜。偶然地卖炒莴笋，炒洋芋，那就是难得的细菜了。什么是苦菜呢？就是不长菜头只长茎叶的青菜，带点苦味，在云南就叫做苦菜。一份菜收5分菜票，遇有莴笋、洋花菜等要收1角钱。我的饭量大，中晚餐要吃5~6两饭。即使这么能吃，每月也只能用上十几元的饭菜票。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月才用了13元伙食费，也即是13元的饭菜票。你想要多用也是用不掉的，因为没有什么贵的菜。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伙食多么糟糕。

大锅菜炒得很马虎，调料只有盐和糊辣椒。在锅里闷着，白菜苦菜就没有了青绿的颜色，变成类似四川煮猪溺的暗黄绿色，也带点猪溺的馊味。

如果运输任务紧张，派不出汽车拉菜，或者没有联系到货源，食堂里就没有菜吃，那么只有吃卤腐。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最长的一次，曾经连着3天吃卤腐下饭。云南的许多县都会做卤腐，食堂里也经常都存储着好多罐。价钱便宜，5分钱一块的卤腐可以下两三餐饭。

那时每月供应半公斤（云南除粮食外，一般都用公斤作计量单位）猪肉，分成两次吃。食堂里经常是把肉切成大拇指见方的块，煮在萝卜汤里，萝卜和肉都是白色。炊事员从部队转业，烹调水平差，弄不出什么花样。

作为我这样的四川人，哪怕想吃一碗在重庆最平常的酸辣小面，那都是办不到的。因为没有面条，更没有佐料，如酱油、醋、油辣椒等。

山沟里买不到酱油、醋，买不到辣椒面。每逢到外地出差或探亲都要买上几块固体酱油，巴掌大方方的块状物，就是盐加点酱色和鲜味剂，包装盒上印着广东庵埠某酱菜厂出品。味道比真正的酱油差得很远，只比没有好一点。后来市面上又有了瓶装的水解酱油，据说是用人头发用盐酸水解的产物。这种酱油特别鲜，但鲜的味道感觉不正常，多吃了使人反胃。后来这种酱油就不再看见了。有一次，我出差时买到了一瓶镇江香醋，带回山沟，那就是很难得的宝贵调味品了。我请陆良人的青工从城里代买一点辣椒面，结果是假货，里面掺了不少米糠。把我气

得要死。

长年累月吃这种饭菜，需要佐餐，只有买点卤腐。5角钱可以买到一口杯，吃上一段时间。吃饭时候，有熟识的人端着碗从门前路过，也会进来用筷子叼一块去。

我就想起了四川的泡菜，于是去8公里外的板桥公社所在地（现在叫镇）赶街，买来泡菜坛，买来萝卜等蔬菜。我的粮食关系在食堂，买不到定量供应的食盐。板桥杂货店里有海盐，不用凭供应证。海盐的样子像蚕豆豌豆黄豆大小的不规则颗粒，带着不少泥沙，呈棕黄的颜色。这种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买来后用开水溶解，静置一段时间，滗出上边的溶液装在瓶子里，下边的泥沙不要。我就用这种海盐饱和溶液加水和酒来做泡菜，做得很成功。

但很快就发生了问题。一是蔬菜来源，要到芳华公社或板桥公社去买。光为了吃泡菜，经常跑几公里、十几公里去买菜，那样毕竟划不来。二是泡菜的清洁问题，四川人都知道，做泡菜需要特别注意，不能沾生水，不能沾油等。在集体宿舍里，有人就传开了：“小黄那里有四川泡菜，味道好得很……”于是张三打开坛子来一下，李四来一下，刚吃饭的筷子也不管，很快地泡菜就生花了。生花少还可以加点酒处理一下，严重时就没有办法，只好倒掉重来。我还做过糟辣子——剁红辣椒腌生姜片。酸酸的，辣辣的，也很好吃。但同样很快就生花变味。几次以后，就没有心思再做了。坛子也被同宿舍的老转（转业军人的俗称）拿去做活酸菜（类似北方人的酸白菜）了。

遇到“五一”、国庆、元旦、除夕等节日，食堂会餐，有较多的肉菜。一般收1~2元的菜票加几两饭票，换餐券。自由组合，8张票打7~8个菜、一盆饭和一碗酒。因为没有桌子，就放在食堂的地上，8个人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围着吃起来。聚餐一般还包括在家吃饭的职工，这时食堂里就很热闹，可以看到几十伙人在喝酒、吃饭。也有时是各自打一份有几种菜肴的饭，各自吃自己的，这要看食堂临时怎么规定。我大多数的春节期间都要回重庆探亲，这是为了多3天的假期，所以除夕的聚餐很少参加。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当年山沟里关于吃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技术科技术员史鉴修去云南模具二厂（是我们同系统的生产7.62毫米枪弹的三线厂，我厂的底火为其配套）处理技术问题，事办完后已是中午，肯定要在这里吃饭了。模二厂也在山沟里，技术科的人去厂办公室领了来宾接待饭票，带我们到食堂，向炊事员交代了就走了。炊事员让我们在厨房的一间空房里等着，端来一碗菜——炒白菜，两碗饭，说一声：“你们慢慢吃吧！别客气！”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我们把菜放在地上，端着饭蹲着吃了起来。因为我们是客人，炊事员也觉得不好意思，便拿了几个红辣椒，烧了烧，放在一碟盐上送来。

还说着：“没有菜，这个给你们下饭。”从食堂的饭菜看出，各家工厂的生活都差不多。这就是那时到兄弟厂出差，人家接待我们吃的“客饭”。

1969年秋天，我在401（冲压）车间劳动锻炼，被抽出来参加蒸汽管道保温工程，就是干活。这是在厂区的野外，把安装在山野里的十几公里长的大小蒸汽管道用石棉瓦包裹起来，外面裹上保温混凝土，再刷上绿色油漆。那时正是火把果成熟的时候，豌豆大小的果实挂满了枝头，火一样的颜色，一片片地在漫山遍野里红得诱人。火把果，学名大棘，又叫火棘，蔷薇科常绿灌木。它还有一个俗称叫“救军粮”，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充饥救急。但这东西籽多肉少，一股酸涩的味道，不那么好吃。

到工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见一起劳动的女青工小马去采摘火把果，用手巾包回来，不停地往嘴里塞。我感到奇怪，心想再饿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因为我厂职工的粮食定量不算低。有人悄悄告诉我，小马怀孕了，住在集体宿舍，爱人在外地。因为反应强烈，想吃点酸东西……女人怀孕了，竟连这么一点极普通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只好吃火把果。说起来真心酸。

我厂有一块天然大草坪，我们这些足球爱好者划了一块标准足球场，用钢管焊制了两个球门架，安装了起来。自发地成立了一支业余足球队，水平还可以。在1977~1978年的一段时间，驻陆良的解放军空军星期天很喜欢来厂和我们踢足球，一来就是开一辆卡车，拉着20来名军人。当兵的生活也很枯燥，所以他们就经常来找我们比赛。那个时候，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踢完球后，厂里总要招待吃饭吧。所谓的招待，就是和我们一起在食堂里，蹲在地上，吃大锅炒白菜和大米饭。有一次，炊事员抓了一把豆腐皮掺在白菜里，我们就感觉比平常的菜好吃多了。我们这边是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吃完了，但见军人那边好像吃得非常勉强，随便扒拉了几口就不吃了。次数多了，才听说他们飞行员一个月的伙食费标准是90元，地勤人员标准是20多元，难怪要嫌我们的饭菜太差了。当时我们这里二级工的工资加粮贴才42元。

长时间没有肉吃，有一天欧阳华（重庆791厂调来的技术员）来约我，找龙潭村的羊老倌（云南人对放羊人的称呼。其他有马老倌等）买羊。这放羊的老倌放有30来只羊，每天早晚都要从车间路过。欧阳出面讲好，买了一只老羊，价钱为5元。因为羊是生产队的，只有要淘汰的，老得不得了羊，老倌才敢卖。羊是我杀的。用一只脚跪在老羊背上，把羊压倒在地，左手抓住角，把羊头仰起来，右手拿菜刀，对准脖子用力一刀，血流了出来，羊挣扎了几下就死了。然后剥皮，切肉，煮了一大锅。可惜的是羊太老，味道不好，嚼起来像草一样。但毕竟是荤菜，多少有些肉味。

1971年秋天，我厂的老技术员高守山和李承民到外地出差，回来时经过南宁。办完事后，在街上找了一家饭馆吃饭。一看是饺子，而且是肉馅，高兴得很。便要了1斤。吃完后觉得还饿，又买了6两，仍然吃完了。再要4两，也吃得精光。那位女服务员很奇怪，怎么这两个小老头这么能吃？便问：“你们从什么地

方来的呀？怎么肚子饿成这样？”他们说：“我们那保密厂在云南山沟里面，难得吃到饺子。”回厂后，把这事讲给我们听，讲得津津有味。他们说，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么能吃？老高 50 多岁，西安人，个子黑、瘦、高。老李河南人，40 多岁，中等身材。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确实吃不了这么多。他们都是北方人，在山沟里长期缺乏油水，也很少有喜欢的面食。一下子看见了肉馅饺子，那个馋劲，2 斤肉馅饺子，轻轻松松地就吃下去了。那时在昆明市还不容易吃到肉饺子。这就让我有了一个印象：广西的生活比云南好。

我也是很能吃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拿着大号铝饭盒去打饭，这天晚餐的菜是炒莴笋。青青的笋片，算是难得的细菜了。我就打了 6 两饭和一份炒莴笋，一边走回宿舍一边吃，吃完觉得没有饱。于是又回到食堂，再打 6 两饭和炒莴笋。回到宿舍，把饭菜全部吃光，这才感觉差不多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一餐吃下 1 斤 2 两饭（上一次是在农村“四清”工作队的时候），所以留下的印象比较深，现在都还记得。

有一次出差，是在冬天里。到了曲靖，要等下午去昆明的火车。中午时分，肚子饿了，吃什么呢？我走到城中心的人民饭店，这是当时曲靖最大的一家饭店，有两层楼，店堂很宽敞，桌子很多。进去一看，哟！厨房里有砂锅白菜，一大排小砂锅，座在相配的灶孔上，冒着热气。顿时我就觉得寒气减退了不少，身上也就热乎了起来。就决定：吃砂锅白菜！于是，五两饭，一个小砂锅端上桌来。菜里有几片火腿、几片瘦肉，几个肉丸子，几块豆腐，煮得很软的白菜，还有很鲜很烫的汤，真是一餐非常满意的中餐！价钱也不很贵，砂锅白菜 6 角，饭 1 角，总共 7 角钱。这餐饭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凡是到曲靖，一般都会来这里吃它的砂锅白菜。

有一年的秋天，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周孜仁从昆明来山沟看我。山沟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就陪他到七公里外的莲花田水库去玩。水库在群山丛林的环抱中，我们饱览了秀美的湖光山色。云南还在雨季，刚下了雨，空气特别潮湿，也很清新。回家的时候，我们走在山林中的小路上，我就在犯愁——老朋友、老同学大老远来，不要说招待，现在问题是家里连下饭的菜都不够……路过一片山岩，忽然间，看见岩石的低凹处长着一片黑糊糊、湿漉漉的东西。哦！有了，那是地木耳。我紧脚快步地走到岩石边，轻轻地在地木耳剥下来。不一会，就剥了一大捧，用报纸包好。地木耳，又叫地皮菜、地衣、地皮菌，是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可以食用。回家后，拣去其中的杂草、树叶，洗去泥沙。然后从坛子里抓了一把腌咸菜，和地木耳炒在一起。晚饭时，老周吃着地木耳炒咸菜下饭，说：“我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吃，味道还不错。”……几十年后，我们在一起闲聊，老周还深情地说起当年在山沟里吃地木耳，给他留下的难忘的印象。

厂办有托儿所，设大、中、小班，接收职工的小孩。那时的产假是 56 天（包括节假日、星期日），只要产假结束，家里没有老人带小孩的就要往托儿所送，一直到上小学。外界的托儿所一般每天给大中班的小孩发糖果糕点，一是适当补充一点营养，另外也为小孩解解馋。山沟里的托儿所没有这个条件，阿姨们只有两样东西给孩子吃，一样叫做“黑咸菜”，另外一样就是卤腐（豆腐乳）。黑咸菜就是云南的玫瑰大头菜，是用酱腌制的，黑颜色，特别咸。切成指头大小，每个小孩发一条。如果遇到吃卤腐，就每个小孩发一小片纸，给刮上指头大小的一丁点卤腐。左手巴掌上托着，右手用一根小竹棍（那时市面上还少有牙签卖）挑着吃。这就是每天托儿所的点心。

直到 1980 年后几年，我的女孩上托儿所，都还是这样的情况。回家后问她今天吃的什么？她就说：“吃的黑咸菜。”或者说：“卤腐。”这样的食品哪里谈得上营养，只能是哄哄小孩。

【生逢乱世】

文革期间我们单位的自行车

陈益南

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现在日益被人们边缘化了。今天，是小汽车，成为了人们出行而青睐的新宠。

然而，自行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很长时期内，确曾是老百姓们的宝贝。文革期间，更是如此。

1969 年时，我所在的工厂，近二百名职工与干部，在很长时间内，公车除外，私人拥有的自行车，竟只有二辆：一辆是配电间明哥的，另一辆，则是一位常常木然着面孔的邹大姐所有。

明哥是厂里的电工师傅，当时 26 岁，尚未成家也未恋爱，号称我们厂的“光棍司令”。

那时，小伙子到二十五、六还没有结婚，就是件很令大家注目及背后遭议论的事，更是让他的父母忧心的问题。哪儿能像现在的年轻人有福气，三十好几的男人，不仅不着急，也不贬值，反倒像国宝熊猫一样可爱，身边常常能围着一群妙龄美女。

明哥的自行车是他父亲给买的，对此，明哥也不讳言。而且，他不止告诉过

一个同事：父亲让他在厂里能拥有一辆显示私人财富的自行车，其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借此帮他“钓”到一位能发展成为“堂客”（妻子）的恋人。

当时，上海出产的“永久”与“凤凰”，还有天津出产的“飞鸽”，是自行车的三大名牌货。但，想要拥有它们，得有两个条件：

首先，得有钱。自行车价格昂贵，每辆车在 158 元左右——几乎相当于像我这样月薪仅三十四元伍角的年轻二级工，小半年的全部工资。凭这价格门槛，就注定了青年工人的绝大多数，难成为自行车的买主。

第二，即便你咬咬牙、紧缩生活开支，再加上请家人支援一些，凑足了 158 元大洋，想到交电公司（专卖钟表、自行车的国营商店）去买一辆“永久”或“凤凰”，但是，交电公司营业员却还会向你伸手问：你的券呢？——原来，还得要一张“自行车购买券”，才能购买。否则，有钱也无奈！“没有券，不卖！”

所谓“自行车购买券”是一张印制精美的白色小纸片，以市交电公司名义印制，并印有交电公司的红印章。但，“自行车购买券”却又并不由该公司掌管，而是由市财贸办公室——市委与市革委会管理全市商业部门的掌门机关，以种种计划性缘由，负责向市内各单位配给发放。那年间，计划经济挂帅，生产效率低下，因而商品匮乏，好一点的物资商品，都以配额出售，并不放开供应。当时，自行车属高档商品，就在配额销售之列。

那一年，厂里分配得了二张这样的“自行车购买券”，厂领导体会明哥这位“光棍司令”的苦处，便给了他一张券。明哥的父亲知道后，连忙从他的积蓄中拿出一叠拾元钞票，让明哥立马去买了一辆“凤凰”28 型自行车。

果然，明哥在自豪地骑上他的“凤凰”后，不到一年，他那“光棍司令”的帽子便给摘了：一位郊区牛奶场职工的姑娘，终于走进了明哥的洞房。

当然，究竟这新娘子是不是被“凤凰”自行车“钓”来的，明哥可从没有向我们作过清楚的交待。不过，明哥那辆“凤凰”自行车为他的恋爱所起的巨大作用，却是全厂有目共睹的。因为，明哥在谈上恋爱后，搭坐在他那辆“凤凰”后座的姑娘，就经常是乐呵呵的。

而做车工的邹大姐，那副木然尊容，现在想来，则是她那辆“飞鸽”自行车给闹的。

因为，自打她买了那自行车后，脸上原曾时常会有的微笑，便逐渐与她绝缘。不过，也不能怪邹大姐将热情换上冷冰，实在是厂里有些同事太不自爱，将邹大姐的宝贝自行车损坏几次所致。

那阵，买一辆自行车，得花费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的几近半年的工资，邹大姐每月薪水也只有三十多元，一辆自行车的售价要一百五六十元。因为她家离厂里远，为方便上下班，她与丈夫一咬牙，降低伙食标准，让酸菜豆腐汤成为她

们家的菜肴标配，才买了这辆自行车。

可是，见邹大姐有了自行车，有些同事，便也搭上了顺风车，跟着享福。每每邹大姐一上班来，她还未将自行车放稳时，就有人向她借车，出去办事。邹大姐碍于同事的面子，尽管不愿，但最后总还是同意了。

本来，自行车又不是凭空捡来的，而是人家省吃少用，才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借了人家的车，就应体谅邹大姐的不易。可是，世上总有些人，习惯将别人的客气，当成他自己的福气。

那些借车的人中，就有几位不仅将每日上班向邹大姐借车一事变为了常例，“人休车不休”，邹大姐一来，那车就被借了出去；而且，几次弄坏了车，还没有一个肯出来认账，更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花钱修车。

这一来，邹大姐的丈夫对她发气了：你要么将车卖了，要么你从此坚定不移再不借车给别人！

她丈夫当然是对的。于是，邹大姐便只有练出一副铁石心肠，做出一副木然面孔，死也再不将车外借了。这样，她的自行车，才得以有了安宁。

那时买辆自行车，对于一个家庭，就是添置一件大东西，其开支是须算了又算的。所以，爱惜自行车，是那时人们的必然心理与做法。

然而，毕竟，自行车是个工具，它是为人服务的。这人与车的关系，也还是应摆清楚位置的。有些人，却往往又弄错了这主次。

进入七十年代二、三年后，厂里有自行车的人，慢慢多了。

部队复员的彭师傅，一分配到我们厂，便用其复员费买了一辆头号名牌的上海“永久”28型自行车。这车用了三年，还是新崭崭的，仍像新买来一样。外单位来我们厂办事的人见此，非常惊异，便经常有人向彭师傅讨教保养之法。彭师傅却不说，而只是得意地笑笑。

其实，厂里的同事，却都知道彭师傅那保养自行车的秘诀。

说来，彭师傅的法子既简单，又不易。为什么？

彭氏保养法的总原则只有一条：宁肯车骑人，绝不能轻易人骑车。

彭师傅对那自行车，他是几条“不能骑”的不成文规定：一、落雨与下雪天绝对不骑，以免损坏车子；二、下岭下坡太陡不能骑，须推着或提着车子，以免刹车皮刹坏车轮钢圈上的光亮镀铬；三、公路不是平整的柏油或水泥路面不骑，以免损坏车胎；四、后座载人时不骑，宁肯推着……

彭师傅的这用车规则，有几个人能做到？

更绝的是，彭师傅每日的首要功课，就是保养他的自行车。每天一到厂，或是一回家，他就忙开了，将那自行车抹了又抹，查了又查，还要给后车轮的齿轮及链条上上机油什么的（反正厂里有的是机油），然后，再给车身有漆之处打蜡

揩光。再后，自然就是乐滋滋地欣赏车子老半天。

这么一搞，彭师傅的自行车岂能不“青春常葆”？

只是，这么一劳神，彭师傅的时间，便都悄悄被他的自行车给吞食了。到文革结束及八十年代初，厂里不少年轻人自学文化后，已能参加高考，甚至报考研究生什么的了，可是，彭师傅却直到后来退休时，还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不经意想想，这自行车，也反映、折射了人世的不少事与理。

彭师傅固然显得过于小器，但，想一想那自行车的价格，与一般人的收入之比，对此，大家也就都能体谅了。

然而，也有在一年之中，新的很快就会变成旧货的自行车；有在一年之中，经常要花掉不少修理费的自行车。这，就是所谓公车。

当时，企业与事业单位，拥有小汽车的极少；政府机关能有几辆，也都只为主要领导服务。

而被称为“公车”的自行车，则比较多。不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业事业单位，都配备有不少。“公车”是无偿配给相关干部使用的；用坏了，还随时可以用公费送去修理。

自然，“公车”的损耗是相当大的，绝没有人能像彭师傅那样精心维护，也不会有我们的邹大姐那样心痛自行车的损坏。

当然，不是所有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干部，都配有“公车”。谁能获配“公车”，是有规则的。不过，配给的范围，也相当广了。

在我们小厂，配有三辆。支部书记骑一辆，副厂长骑一辆（厂长不会骑自行车）。另一辆，是负责采买事务的食堂总务专用。

我们厂的上级公司，机关有 60 人左右，配有 30 多辆公车。除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那时还没有“总经理”一说）们自然人手一车外，公司各科室正、副科长也都一人一车。武装部长、团委书记也不例外，一人一车。其他干部，视其工作性质，或科长决定，也很多都配有。

再上级，是市商业局机关，那儿的干部，除非你不会骑、或不愿骑自行车，几十个机关干部，基本上都有，是标配。

这种“公车”，配给了你，就几乎等于是你自己的了。可以每天骑回家，可以让家人使用，可以在休息日作为家庭出行工具。其他人想使用，需要向你借，而且还得你同意。

而与私车比较，使用者除不需担心车的使用状况，修理费全部公款支付外，更还有他们不经意而常显示的一种优越感：拥有“公车”，就是拥有了某种地位与特权。

最近，常看到有些老干部写的文章中，说他某年骑辆自行车，去某地方看某

人，或办某事。一些年轻读者便认为当年这些老人真是艰苦朴素啊！当那么大的官，还骑辆破自行车。

殊不知，当年，那骑自行车的老干部，骑的是“公车”！本质上，就是现在坐公用小汽车一个样。

2014年7月23日

【生逢乱世】

我在文革中的草民生涯

谢声显

在长江边拉大锯

1967年春，我本在万县市精米厂做临时工，每月挣24元。因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等原因，我虽未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却在全国突然开展的“二月镇反”运动中，因为看见了死于非命的同学向中雄的遗体，21岁的我冲动之下跨进了造反派抬尸游行的队伍，从而失去了精米厂的这份工作。

在家里呆了十多天，吃饭的问题就出来了。没办法，我只得出门去找活儿干。

这时，各单位揪斗“反革命”肃清流毒的活动如火如荼，镇压者和被镇压者都没心思干正事了，哪还找得到临时工干？我无头苍蝇般到处撞了半个月，无奈之下，只得将前年由铁路上返家时在贵阳买的那件短大衣卖给了一位叫晏庭礼的朋友，得了8元钱，用以救急。

没过两天，晏庭礼就来找我，说是木材公司需“解（读改）匠”（拉大锯将原木改成板材）。我本不会拉大锯解木料。但老晏说他会，且家中有现成的解锯，我只需出资买一把专用的三角锉刀，便能与他搭档去挣钱。

我就当了南郭先生。同老晏到两层桥下面沙滩上木材公司搭建的小木棚里登记，令我大喜过望的是，这儿不像其他单位招收临时工那样要居委会出证明，也不盘问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只要你提一把解锯去就行。

“大跃进”时，有大批伐木工开进川藏边的原始森林，但因不通公路，那些砍下的木材很难运出来。有聪明人便想到了水运，将砍下来的原木堆码在林区的小河边上，待夏季洪水暴发，无数原木便与山洪一起顺流而下，从各条支流汇入长江。沿江的木材公司就组织人力将其捞上岸来，各地能捞到多少算多少，加工成材再按计划调拨出去。那年代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森工局只管砍树而不管木材的去向，木材公司只管捞也不花什么成本，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没有企业利益更没有个人利益，谁都不敢去染指公共财产。即使真有个别胆大心贪的

人也无计可施，水中的原木那么大那么重，你一个人也搬不动藏不了。如果纠集几个人去偷，那百分之百会立即落入法网。人人都在严密的组织中生活，别说你干什么，连你想什么，组织都知道。所以当年发明水运原木的人真聪明，适应当时的形势，万里长江边只有木材公司去捞而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去捡便宜。江边长大的我和朋友们都在激流中为木材公司捞过原木，1角钱一根的工钱。秋季水退后，这些原木就摆满了沙滩。现在，我们要解的便是这满沙滩的料。

我们先在乱七八糟的原木中寻几根大腿粗细的小树干，钉成两个叫“码架”的三角架。挑中了一根原木，便将码架拖过去，将原木抬上码架后，便去请木材公司的木匠过来。他眯着眼打量一番形状和材质，确定了要将这根原木解成什么料之后，就在原木上弹好墨线，我们的任务便是顺着墨线将其一块块地解锯成不同的板子或木方。

开工时，必须依线下锯。两伙计各站一边双手平端解锯，弓步侧身，有节奏地扭腰推拉。木屑纷飞中，平直地将原木解锯成各种木材。这活儿特别需要配合默契，若一方用力不均，解出来的平面便有起伏，行话称为“挖瓢”，坏了料要挨骂还得扣工钱。

当解匠是计件制，没上下班时间之说。干多干少，全由两搭档自己商量。什么时候不想干了，就叫木材公司的人来“收尺”。用皮尺量好你当天的劳动成果，记在你的名下，等到半月结账时计算。然后，那工作人员就在收过尺的木料上洒几行红墨水，算是入库了。隔一两天，有搬运队来将沾有红墨水的板材运走。

由于有力气，在老晏的帮助下，不过两天，我这南郭先生便成了个熟练的解匠，不再“挖瓢”了。

当时手工解料的报酬有3个价码：分板，每平方尺0.35元；寸板，每平方尺0.38元；木方，每平方尺0.42元。只要肯卖力气，这活儿收入也不低。露天劳作，虽然雨天不能出工，每月总要被迫休息几天。但半月结账时，我和老晏都能挣20来块钱。

当解匠的日子里，我每天清早在后裤兜里插上一把专门用来打磨锯齿的锉刀出门。若时间还早，便进斜对面街边那小饭馆，花4两粮票4分钱，买8个细软绵实的白糕，再用1分钱买一大土碗热气腾腾的豆浆。这家小馆子的每张桌子上都放有两个碟子，分别盛有切碎的葱花和食盐，供顾客免费取用。热豆浆里搁进盐和葱花后，就会变得有滋有味，香气扑鼻。吞下几个幼儿巴掌大的白糕，再灌进一大碗豆浆，真是又暖又饱，浑身舒畅。但这米粉作成的食品太容易消化，不适合体力劳动者，干上一会儿，胃里便空空荡荡。但当时我每月的定量粮只有24斤，逢月小30天，每天才8两粮。早上吃4两，已经大大地超了标准。好在“粮食关”已经过去，黑市上能买到高价粮票，我才敢这样吃。若起床晚了，便只得将

2两粮票1个的馒头买上两个，边走边往嘴里塞，到得江边，就伏在石头上伸长颈子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冰凉的江水。以前，万里长江在上游的流速极快，自身净化能力很强，千百年来，江边的人们自幼便常喝江水，非但未闹过肚子，还觉得清甜爽口。

做上了“长期临时工”

1968年，我进地方国营万县市肥皂厂做长期临时工，工作岗位——司炉工，一级工待遇（每月基本工资25元，粮食补贴1.5元，合计26.50元）。所谓长期临时工，是由于文革期间，全国所有企业都奉命停止招收正式职工而产生的一种新用工形式。虽是“长期”，但却又是“临时”，所以正式职工享有的许多福利和权利我们都没有，但又不同于企业临时找来干上十天半月的那种临时工。我们毕竟是市里下了红头文件招进厂的，只要锅炉还在，又能胜任工作，厂里就每年向市里打一次报告，继续留用。我就从1968年一直“临时”到1974年，终于等到中央下发了凡连续在一个企业工作了多少年的长期临时工可以转为正式职工的文件后，经市劳动局批准，才转为正式职工。那每月26.50元的工资，我拿了8年，直到1976年，我儿子都1岁了，方遇到全国职工工资普调，我被调为二级工，每月增加了5元钱。那时代，全中国所有职工转正和调资这种事儿，都是要国务院下文件才得以执行的。这就是计划经济。

1968年12月1日，当我拿着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介绍信到肥皂厂报到时，距我23岁的生日只差两天。也就在那一天，我还认识了同去报到的另外两位司炉工，顾明贵和肖松桥。肖松桥在厂里没干几个月，因为是应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被“清退”了。几十年后，他作了万县地区建筑规划院院长。顾明贵本是东北一家医院的医生，受派性“处理”返回老家的。厂里人数增多后，他作过伙食团长，还创办了肥皂厂的医务室。后来，顾师兄在东北所属的一派重新掌了权，他才带着那位性格温和的东北妻子小刘和在万县市出生的儿子返回了黑龙江。然后在县人民医院从医生直干到院长，又调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当主任。听说他退休后在县城开了一家诊所。

我到肥皂厂报到时，新购置的那台1.5吨卧式锅炉已安装调试完毕。由于新锅炉比厂里原有的那台0.2吨立式老锅炉大，耗煤和劳动量均增加了几倍，按相关规章，这种锅炉每班必需两个人操作，肥皂厂才新招了我们3人，给锅炉房每班分了1个。

第二天一早，先到伙食团，就着泡菜匆匆吞下3两馒头和1两米的稀饭后，便被分管生产的文副主任叫到保管室，领了毛巾手套工作服等劳保用品。然后，

他将我带到了锅炉房。

宽敞幽暗的锅炉房正中，躺着那台形状似油罐车，但比油罐车还大还黑的卧式锅炉。由于锅炉旁堆满了一人多高的原煤，屋子里便显得并不宽敞。在锅炉前面那块狭窄的空地上，一位中等身材的壮年工人正在操作。锅炉下方有两个1尺见方的小铁门，他用戴着帆布手套的手拉开了左边的铁门，炉膛约有2米多长，1.5米宽，里面烈火熊熊，发白的火焰被烟囱里的风扯得呼呼作响。他躬下腰，用铁锹铲起满满一锹原煤，走近炉门潇洒地一挥，那四五公斤煤粉便均匀地撒进了左边炉膛最深处，第二锹均匀地撒在中间，第三锹才撒在近炉门的那块地方。我记住了：一个炉门3锹煤。

待他关上炉门直起身来，文副主任便赶紧给我俩作了简短介绍，我就认识了师傅张德元。张师傅向我点了点头，他一边用挂在脖子上那污黑的毛巾擦着额上的汗，一边指着右边的炉门说：你烧这个门，注意要将煤撒均匀。我连忙戴上手套，打开右边的炉门，操起铁锹，学他的样子朝炉膛的右半部分上煤。我身强力壮，干惯了体力劳动，还在铁路上作过混凝土工，有成天挥舞铁锹搅拌混凝土的经验，那铁锹在我手上便驯服得很。虽然是初次给锅炉上煤，但我一上手便很像那么回事儿。这第一下虽然没有张师傅将煤撒得那样均匀，却也获得了他和文副主任的称赞。我这个未经任何学习或培训的司炉工就正式上岗了。

在白班的8小时里，两个司炉工要这样躬着腰一锹一锹地撒5吨左右的煤进炉膛。上过几次煤后，炉膛内经过充分燃烧的煤会变成炭渣，炭渣在高温下就会板结成块。此时便要打开炉门，操起酒杯粗细长约3米的钢撬棍，从炭渣下贴着炉排使劲捅进去，要一边使力往里捅一边抖动撬棍，让煤灰从炉排缝里漏下去。将钢撬棍捅到底了，还需借助全身的重量，握住撬棍头子往下压，将里面凝结成块的炭渣撬松。这叫“漏灰”。我们使用的撬棍虽然是用酒杯粗细的圆钢做成，但由于炉膛里温度太高，撬棍很快就会在里面被烧红变软不利操作。为了撬棍不容易被烧红变软，不久之后，我便去置办了一根更粗的撬棍，重53斤。别人都嫌太粗重，不爱用它，这根撬棍便只供我个人使用了。但碰到原煤质量不好时，板结的炭渣就太多太硬，干完一趟，即使这么粗大的撬棍，也经常被烧红后因用力太大而变得似弯弓一样。此时就需趁其还未冷却变硬之际，抡起它来将变弯的地方朝青石坎上使劲地砸，将其“扳伸”，以便再次使用。

这样反复撬松过三四次后，炭渣经过烈火高温，便形成司炉工们称为“牛脑壳”的东西，坚硬地粘连在一起，此时就得“出渣”了。出渣是每天最苦最累的活儿：打开炉门，在烈火的炙烤下先将“牛脑壳”撬断撬松，再用一根拇指般粗的钢条作成的大钩，将弄碎了的“牛脑壳”一砣一砣地掏出来。通红的“牛脑壳”被掏出来便堆在炉门前，两人各自一个门，轮流站在炉门口操作，即使在最

顺利的情况下，每出一次渣，一个人起码得站在那堆通红的炭渣前干上 15 分钟。其它季节都还好一点儿，特别是夏季，出一次渣，真是“连裤裆都湿透了”。出渣时还得小心注意，千万不能将还在燃烧的煤粉捎带出来，或让其顺着炉排漏下去多了，那样锅炉就会熄火。万一熄了火，就会影响全厂的生产，麻烦就大了。

作为一个老式锅炉的司炉工，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以上几套。另外要做的什么进水、排污，或一些检修，都是极轻松的小事儿了。

20 年后，随着生产规模的发展，我厂成了国有中型企业，搬迁到了郊外。厂里使用的已是一台 10 吨的全自动锅炉。也不叫锅炉房了，叫动力车间。我时任厂工会主席，偶尔也爱转过去，看着装整洁的司炉工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操作间里，轻松地边喝茶边按电钮上煤、震动炉排漏灰、出渣。想到自己烧锅炉时那一身煤灰满脸汗污的情景，还是颇有点感触。科技进步真快！

那时代，司炉工是厂里所有工种中劳动强度最大的，每月的粮食定量也是全厂最高的：45 斤，就觉得很幸福。因为定量高，不管哪个厂的司炉工，都有一个黑黢黢的小镬锅，上班时间常用它在炭渣上煮东西吃。青菜豆腐、红薯洋芋、面条腊肉，都在那黝黑的小镬锅里翻滚。年青力壮胃口好的人，每天能煮点东西吃，也真是一种享受。当我煮那每月一次的“劳保食品”时，还在厂里引起了轰动，许多人都来欣赏我是怎么样吃下去的。

那年月，司炉工每月能格外享受白糖、猪油、白酒各半斤“劳保食品”。虽然这些东西在发工资时也要扣钱，但那是别人拿钱也买不到的计划供应物资啊！每当领到劳保食品，其余几位或是好好保存起来，一点一点地慢慢受用。心疼老婆娃儿的人，还带回去全家共享。我当时还是个一见到美食便忘了父母的混账人，每月只要一领到那 3 个半斤，就会将半斤猪油和半斤白糖全放进小镬锅里，在炭渣上将其煮化并搅拌均匀，使其变成蜂糖状的油糖。待稍降温后，我就端起酒瓶，一口白酒一口油糖，趁热将这 1 斤半白糖猪油白酒全装进肚子，让它们在胃里去融合。那东西甜蜜蜜的，特别滋润。当时纪律松弛，没人管你上班时间饮不饮酒。我喝光这 1 斤半美食后，还要吃半斤米的干饭，继续干活。现在的人一听这种吃法，肯定会说愚蠢，但那时的劳动人民没什么健康常识，何况许多年大家都处于物资匮乏的生存状态，连糖尿病都被社会上称为“老干部病”，寻常百姓都没资格生这种病的。所以，长期缺乏营养的人偶尔一次暴食，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司炉工是三班倒，每周转一次班。对于有些人畏惧的“三班倒”，我倒不怎么在乎，人年青，又从事重体力活儿，就没有什么打乱了生物钟要失眠的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倒头便能睡熟。上夜班到凌晨时，即使是两次上煤之间的几分钟空隙，我也能在破藤椅上坐着入睡。睡眠的问题，就并不令我生畏。更由于每天

还有1角2分钱夜班津贴，可以去馆子吃一碗杂酱面，我就喜欢上夜班。

我虽然每月只有26元5角钱的工资，再加上每个中、夜班有1角2分钱的补助，全加起来每月也上不了30元钱。但由于收入稳定，每月能按时领钱，也就有了计划开支。我父亲的退休金加上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的母亲的工资，每月总共才40几元，3个被停课闹革命的弟妹都还没有收入，我每月就给家里交5元钱，偶尔还给弟妹们发几角钱零花。自己在厂里的伙食费每月6元左右，由于有工作服，再加上每人要攒几年的布票才够做一件衣服，也就常年添置不了新衣。我记得最大的一笔开支是1969年，花40元钱在拍卖行买了一个二手的机械手表，苏联制造，样式虽然粗笨，但走时还蛮准确。

在进厂3个月后，我就生平第一次开始存钱了。到储蓄所办了个活期存折，每次关饷时将上月未花光的几元钱存进去。两年之后，当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进看守所时，留给家里的存折上就有了一百元钱左右。在当时，那可是笔巨款呢！

锅炉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当年我们的业余时间很少。革命委员会成立过后，1969年开始，全国所有机关企业每周一、三、五晚上的政治学习都恢复了。各厂除了正当中班不能离开岗位的人，任何人都不能缺席。不管寒风刺骨的冬日或暑热未消的伏天，也不管你住的地方有多远，晚饭后都必须跑到单位去，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起听以“大老粗”为荣的领导结结巴巴地读报纸念文件，灌输所谓的先进思想。然后依次发言表态谈感想。就连许多“根红苗正”的人们，对这种学习制度也并不拥护，但却谁也不敢反对，那是政治啊！全中国的单位都必须执行这种学习制度，叫做“政治学习、雷打不动”。

除去政治学习以外，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城市里也只有电影院在反复地放映着《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寥寥几部革命电影，及歌颂文革的纪录片和《新闻简报》。偶尔有外地的宣传队来演出，虽然是不同地方的宣传队，但节目却是大同小异，穿仿军装的青年男女一上台便挥拳跺脚，大喊大叫。后来又是翻来覆去演那几个样板戏或样板戏选段，但在那文化荒漠的时代，只要有人唱和跳，就能吸引许多人去看，我自然是一场也不会放过的。但对实在让人倒胃口的“样板戏电影汇映”，即使是免费观看，我也尽量选择逃避。

真正吸引我的，是篮球赛。

老万州人都应记得，自从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过后，每周六晚上西山公园灯光球场的两场篮球赛，绝对是全市人民最盛大的精神会餐。不管酷暑寒冬，

只要没下雨，周六晚上的7点钟之后，西山公园的露天球场边真是人山人海。我和朋友们都成了每场必看的球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武斗曾使球赛中断过一段时间，但局势刚刚稳定，在体委掌权的一派马上便恢复了周六晚上的篮球赛。虽然都是本地各企事业单位的业余球队，每周进行的也只是当时流行的“友谊赛”。市糖酒公司、运输公司、港务局等篮球强队和几位主力队员，都成了市民们心中的明星。我的二弟声宏，是各校学生联合组成的“红代会篮球队”（又称万县市青年队）的主力，他也经常在灯光球场上奔跑。若逢外地有球队来访，就更热闹了，体委便会将各单位的篮球明星凑合成一个市代表队来迎战，更引得球迷们兴奋激动。周六晚上，一般都安排两场球赛，每到散场时，整个西山路，好一阵子都被出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全市所有的政府机关都瘫痪了，唯独这个体委，每周还在组织比赛。因此，当时的市体委，就成了最受市民们欢迎的部门，体委的工作人员不管走到何处，都有人认识，都受人尊重，就连在商店排队买东西，也会有人让他往前面站。

我这个锅炉工还是个文学青年（文革前发表过诗歌，文革中编辑过小报）。对于我来说，最为享受的“文化生活”，就是读文学名著——而且我这读书还经常不是“业余”，而是在上班时间。

每逢上夜班，锅炉房里没一个外人。不打瞌睡时，便可以在空闲的间隙读书。接班时，我就经常带一本书去。在锅炉边的深夜里，我读过的书不少，印象最深的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记得读这部书时正值寒冬，锅炉房外真是雨冷风烈，满地泥泞。深夜里，我靠在锅炉前的破藤椅上，捧着这部书，就好像走进了俄罗斯那白雪皑皑的原野，无边无际的森林。通过屠格涅夫优美的文字，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遥远时空中的特殊魅力，仿佛能与那些大胡子俄罗斯农夫一起，坐在篝火边交谈，喝烈性的伏特加、抽辛辣的莫合烟……

说到文学名著，文革初期大多都被定成了“封资修毒草”。文革一开始，我家便被官办的“红卫兵”抄了。十几个人翻天覆地地搞了许久，结果除了拿走一堆政府办的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由新华书店卖出的小说，什么可以借题发挥的东西都没找到。我还是在劫难逃。说来现在的青年可能难以置信，由于从我家抄走的“罪证”只有小说，每次批斗会上的主题便是追查我读过些什么“封、资、修”的作品。

经过两年血淋淋的武斗和惊心动魄的夺权，我们这地方连武斗时杀人的凶手都还没有全抓起来，当权者就没多大兴趣来管读文学名著这种小事儿了。因此，除了不敢公开张扬外，也没多大风险。但由于“破四旧”的扫荡，各地图书馆都不曾开放，我所读的书籍从何而来？除了朋友们互相交换那些幸免于难的或者从抄家物资中偷出来的外，更不得不提到那早已作古的朋友丁永昌。丁永昌也是个

文学青年，我俩是一见如故，很合得来。我经常到马仑岩他家那土墙瓦顶的老房子里去畅谈，他就主动借些盖有“光滢藏书”印章的中外文学名著给我，都是些令我一翻开便不忍放手的好书。永昌说，那些书是姐姐留给他的。书的主人光滢是他姐姐的同学、好友，1964年去云南东川当了铜矿工人，行前把这些书托给他姐姐保管。次年，他姐姐又被动员去巫山“劳动大学”改天换地了，这些书就落到了他的手里。直到30年后，我才认识了那些书的收藏者邵光滢，他已在自贡的一家公司当了老总。他说自己在离开万县市之前，也是个到处打临工的文学青年。

我回忆这些琐碎的往事，不是因为人老了无所事事便爱回头去看自己的足迹。我期待这些草民的经历能让人们更好地明鉴过去，能让后人从往事的云烟中发现更多可供借鉴的教训。我最深的期望，是通过我们无数过来者的绵薄之力，使后人不再经历同样的浩劫。

【生逢乱世】

“伟大年代”生活琐忆

何 蜀

1970年元旦前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合写的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社论一开始就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篇社论满怀豪情地宣称：

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公开论战，激烈搏斗，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蓬勃发展的十年。

.....

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相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巩固，更加繁荣，更加壮大，更加朝气蓬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辟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大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七亿人民中空前大普及。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深远历史影响，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当代反帝反修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成为世界革命的希望。

现在来读这样的文字，有点像读笑话。在这篇充斥着自欺欺人的假话、大话、空话的社论中，展望七十年代，只谈到如何进行“斗批改”，如何“整党建党”，如何“备战”，就是不提一句如何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真实的七十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打捞记忆，找到这样一些碎片。

“群专游街”

“群专”，即“群众专政大军”的简称，这是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许多地方建立的一种官办的整人组织，其名称的来历是毛泽东 1967 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中地区（简称视察大江南北）的一系列讲话中的一段话：“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1969 年 3 月 25 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建立“群众专政大军”的几点意见》，截至 7 月，全市上千个单位建立了“群众专政大军”，“群专”队员达 30 余万人（《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147 页）。“群众专政大军”可以随意抓人、关人、打人、抄家，成为那个“无法无天”年代里红色政权迫害群众、炮制冤假错案的重要工具。被群众私下称之为“专政群众大军”。8 月 8 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重庆警备区召开全市第一次群众专政大军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着重研究了加强群众专政大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同日，《重庆日报》发表有关报道及评论员文章《群众专政大军好》。

在那段时间里，群众造反组织已经全部撤销了，社会上只有“群专”人员戴

着红袖章——不要以为文革中戴红袖章的都是红卫兵、造反派，那要看在文革的什么阶段。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阶段，戴红袖章的已经不是造反派了。当然“群专”中可能会有个别原造反派成员，但更多的是“根红苗正”的原保守派成员或陆续从部队上转业、复员、退伍的军人。

“群专”按“新生红色政权”的指示抓人、抄家、刑讯逼供之类的恶行令人切齿痛恨，特别是受害者及其家属永世难忘。但对于“群专”的另一些日常作为则很容易被人淡忘。

当年在重庆市最中心的闹市区解放碑，曾经出现过不会“载入史册”的“群专游街”景观。

解放碑那时还没有成为“步行街”，汽车可以从解放碑下经过，特别是在朝天门与上清寺之间的公交一路（即后来的401路）电车，来回都要从解放碑下经过。只不过当时车少，因此汽车总是在满街的路人中鸣着喇叭慢慢穿行。到了晚上，解放碑周围来往的人更多。

在“群专大军”鼎盛期的一段时间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后，在解放碑下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就会出现一个场面：人们纷纷闪开一条通道，有的在两旁驻足观看，有的则避之唯恐不及赶紧离开。原来，是一小队“群专”队员来了，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大约五六人，排成一路纵队，趾高气扬，如入无人之境。领头者手拿一个铁皮话筒，有节奏地高声呼喊：“坚、决、打击——！”

紧接着后边几个“群专”队员依次分别高喊：

“小裤管！”

“飞机头！”

“尖尖皮鞋！”

……

按照人员的多少每人喊出一个需要打击目标的名称，最后一个队员喊的是：

“穿网鞋不拴带带的！”

如此反复数次，然后这一小队人在众目睽睽下扬长而去。

他们要“坚决打击”的，都是人们日常穿戴中的一些个人爱好。早在文革以前，社会上就已经把穿小裤管、梳“飞机头”等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被认为是“流氓阿飞打扮”，而真正进行打击，则是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在北京以外的许多城市实际上是在9月才出现，应叫“红九月”）的“大破四旧”中，当时街上抓到穿小裤管的人，会被当街剪开裤腿，抓到梳“飞机头”的人，会被强行剪乱头发，穿尖头皮鞋的人，会被勒令脱下皮鞋，当街砍掉皮鞋的尖头……而“群专”要打击的这个“穿网鞋不拴带带的”，则是当时在一些时髦青少年中流行的，穿那种白色网球鞋（简称白网鞋或网鞋），为方便而不系鞋带。

这些，当年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打击”的对象。

从头管到脚，这就是那个“伟大年代”里的“全面专政”。

如今，解放碑下已经成为繁华热闹的步行街，四周高楼林立，被一些外来者视为“曼哈顿”，白天晚上都挤满游人，特别是在每年的“平安夜”，那里更是人满为患，成为青年们狂欢的地方。再也无人知道当年这解放碑下曾经有那么一小队青年“群专”队员高喊着那些“坚决打击”的口号在人群中趾高气扬地来回巡游。

“三转一响”及其它

七十年代初，我刚进重庆市郊区（如今已算主城区了）一家市属钢厂当工人，每周末进城回家一次。在一次回家后，听邻居二哥（在江北区上班的银行职员）讲起了“三转一响”这个说法的来历。邻居二哥和他的妻子当时都是“老二级”，即拿了多年的二级工资，因文革把一切都停下来了，什么事都说是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而这个“运动后期”大家却从1966年盼到1967年、1968年……1969年“九大”开过了，仍然不见“运动后期”到来，还要不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人们盼着加工资的希望又落空了。

但是生活总得进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并不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四旧”而使人们放弃一切物资追求，只靠背诵一段“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之类的“最高指示”就可以成家。于是，民间就有了对“三转一响”的追求，并传开了有关“三转一响”的故事。

某男，青年工人，看上了公交车上一女售票员，欲与之交朋友谈恋爱，特意去乘该车，并用当时最大面值的十元钞票购票，递钱过去时说：“买一张八分车票六十一母。”女售票员收钱、撕票、如数找补后，对其话语中后半截的“六十一母”不解，未予置理。隔日，某男又来乘车购票如前。如是者三。

女售票员将此蹊跷事告知闺密，有领悟者曰：其意为自我介绍工资六十元，家中只有一母，无其他负担。条件甚好（当时工资在六十元已属高收入了）。建议可考虑接受之，并授意如此如此。

女售票员遂在下一次向某男找补零钱时曰：“补你九块九角二三转一响。”某男闻听，知有回应，甚喜，但对其话语中后半截的“三转一响”不解。回去咨询哥们，有知者释疑。某男恍悟。

此后数日，女售票员不见某男再来乘车。忽一日，车行中，闻车旁有自行车铃响甚急，女售票员探头往车窗外一瞥，原是某男正骑一崭新自行车从旁驶过，扬手向其示意——手腕上戴着新手表，自行车后座置一新收音机，并立一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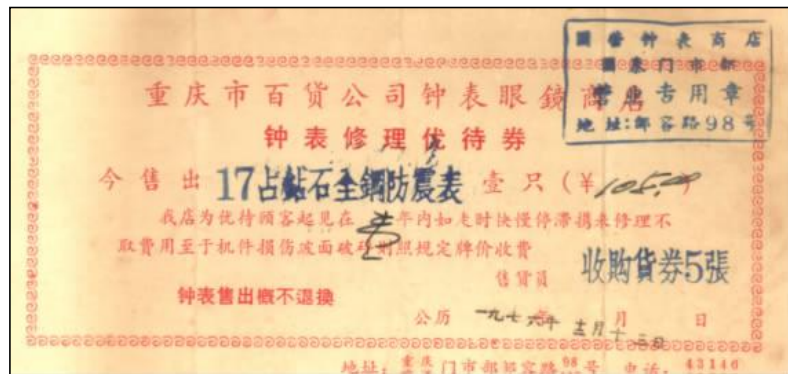
上大书几个字：“缝纫机缺货已托人去买！”……

这就是当时民间对于男女青年谈恋爱时物资条件的最高要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样会转动的东西）和收音机（一响）。

我听了这个故事，觉得颇有趣，回厂上班后，即在工间休息时向工友们讲起，众皆大笑。

当然，对“三转一响”这样的“高档”物资消费，我们那些青年工人都只能望洋兴叹。我们那批进厂的伙伴都是以前做过临时工的“社会青年”，年龄偏大，所以都没有安排当学技术的学徒工，只能做“普工”（即粗工，杂工），工资比学徒工的每月18元略高一点。厂里有些青年女学徒工为了买手表，不得不拼命攒钱，在食堂买饭菜时，一般最便宜的蔬菜是五分钱一份，可是我经常会看到排在我前边的青年女学徒工对售饭窗口里的大师傅说：“买两分钱菜汤。”即是叫大师傅只给她舀一点蔬菜的汤水下饭。她们以这样的方法，每餐省下三分钱，就为了能早日买上一块手表。

还有一点可能许多人都不记得了，当时买手表，除了要有钱，还得要有一定数量的“购货券”。我是在进厂工作几年后，才买了一块手表，要不是保存



下了当时的购买发票（见上图），我也根本想不起买手表还要有5张购货券。至于当时这购货券是怎样发放的，我又是怎样攒齐的，已经完全记不起了。

夜来吆喝声

文革以前，街巷里经常能听到各种吆喝声，有卖小吃的，有走街串巷卖菜卖水果的，有收荒（废旧物资）的，有磨菜刀剪刀的……文革“大破四旧”和“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全都没有了。我邻居的邓伯伯在外边走街串巷理发，就曾被没收理发工具。

在七十年代初，我家那个小巷里，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出现一种吆喝声。这是一个老大娘苍老的声音：

“楼上楼下的同志们，请听到：‘四防’工作要搞好！防火，防盗，防特，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门窗要关好，晾在外面的衣服要收了。来客要报户口！”

“防火防盗”，现在的人都好懂，“防特”，就是防止特务搞破坏。文化大革

命前人们看电影都喜欢看反特故事片，那时的特务都是所谓“美蒋特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了“苏修特务”、“日修特务”、“朝修特务”等等。“来客要报户口”，这是如今的人们已经很生疏的事了。当年，无论家里来了什么亲戚朋友，只要留宿过夜，都必须向当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以备调查监督，否则就会遭到清查。因为那个年代是处处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当时如果哪户人家有谁是在政治上有什么问题的，一般都不敢让来客留宿，以免报户口多生事端，甚至会惹得派出所的人半夜来敲门“查户口”……

那个老大娘每晚都是从坡下的小巷开始吆喝，慢慢爬上台阶，穿过我们这条小巷，来回吆喝一遍后，再下坡返回她家里。每晚如此。是不是风雨无阻我已记不得了。她并不是街道居民委员，也没有谁安排她做这样的事，而是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自觉自愿来当这样的“义工”。

日子一长了，街坊邻居的小孩们都听熟了，就开始学着她吆喝，并且，每当她吆喝过来的时候，小孩们就都屏息静气作好了准备，等到她吆喝到最后一句“来客要报户口”时，左邻右舍的小孩们往往就会齐声高呼：“来客要到渡口！”然后哄堂大笑。

那时晚上没有电视看，这就成了一段时间里小孩们的晚间固定娱乐节目了。

后来看电影《芙蓉镇》，看到那个反面人物在文革结束后疯了，见人就疯疯癫癫地吆喝一声：“运动了！”这时我就会想起我们小巷里那位老大娘的夜来吆喝声。

后来听说，那位老大娘因“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受过打压，精神上有些受伤，为了表现自己“革命”，就主动采取了这样一个她力所能及的行动来“挣表现”。

据说，以后是她的子女阻止了她继续做这样的“义工”。小巷里才不再有这样的夜来吆喝声了。

乘公交车要“经过几个国家”

在七十年代中期，虽然已经没有群众组织的武斗，没有群众造反运动的疯狂，但社会秩序仍然极不正常，尽管“九大”以后一切都有了新的中央和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但是“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三老会”、“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不断折腾，整个社会依然很难恢复正常。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里，仅乘车难这一问题就长期得不到解决。

那时候人们远行都只能乘公交车，而公交车又很少，往往等得人心焦——因

此人交（人民交通）公司就被人们叫作“焦人公司”，好不容易车来了，急于乘车的人们就会争先恐后蜂拥而上。于是，就传开了这样一个说法：乘公交车要“经过几个国家”。哪几个国家？

首先是“越南”——越栏，翻越候车处的栏杆，本来都站在候车栏杆隔出的地方排队等候，但一看到车来了，人多车少，担心上不了车，排在后面的人就会翻越栏杆抢先上车。于是秩序大乱。

接下来是“古巴”——川语叫“牯爬”，即强行爬上车，车门挤不上去了，有的就从车窗强行爬上去。

上车后就得经过“埃及”——挨挤、“几内亚”——挤累压。

下车时得经过“朝鲜”——不把堵塞在门口的人朝两旁掀开，你就别想下车。

到后来，根本就不经过“越南”了，等车的人们都不再站在候车栏杆里，而是纷纷站在栏杆外的路边，有时甚至站到路中间拦车——因有的司机看到人太多了，怕被挤吊着人，车走不了，干脆就不停车开走。于是人们就强行拦车再拼命“古巴”。

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就在七星岗等车时，被拥挤的人群挤倒在车轮下压断了腿。

那时候有一个常见的都市景观：驶过的严重超载的公交车车门上吊着人，电车后面的梯子上吊着人，摇摇晃晃驶过……

解禁图书与“技术处理”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为了安定人心，周恩来主持了一些以“批判林彪极左路线”为名的纠正文革路线的工作。文革以来，出版物大多被作为“封资修毒草”查禁，图书馆关门，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著作外，就只有几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金日成选集》及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之类书籍。面对广大群众无书可读的局面，中央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多年禁锢的图书出版开始略为解冻。1972年2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春节前后将陆续出版发行一批新书画，包括《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季米特洛夫《控诉法西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文学出版社加工再版（文革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高玉宝》等。出版这样寥寥几本书，居然还要由当时最大最权威的官方媒体来进行煞有介事的报道，足见当时出版之凋敝。

大约就在这前后，久已封存的文革前的图书开始获准部分解禁。

当时我在钢厂里当工人。厂里有个小图书室，一个年轻姑娘小王是管理员。

她丈夫在城里一个文艺团体工作。因为我经常去借书，她发现我是个爱读书（常借那些很少有人借的哲学、历史方面的书）也很爱惜书的人，对我很信任。当时书籍出版与销售也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出版了些什么书，全都经过各级新华书店按单位级别（我们厂当时是县团级）分配给各个单位。有时，小王要到区新华书店去提分配给厂里的新书（厂里不会派车，得自己去提着书捆乘公交车），她会叫上我一起去帮她提（一次大约能买到二三十本新书，分成两三捆）。买回来后，她允许我优先翻看，有我想看的书，可以让我先借去看。当时上海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摘译》之类书我就是那样先睹为快的。

有一天，我在她那里看到了一份上边发下来的文件，内容是关于各单位可以经过“技术处理”解禁一批文革前出版的书籍的通知，文件附有一个详细的列表，标明了一长串可以解禁的文革前出版图书的名单及分别需要做哪些“技术处理”的说明。

文革中对书籍内容做“技术处理”，在这之前已经有过最有影响的两次。

一次是刘少奇被明确打倒后，1967年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毛主席语录〉两处修改的通知》，提出：“一，204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目录第二页第九行也按此改正）；二，208页第二段第五行‘刘少’二字起到第九行‘（大笑）’二字止删去。”国务院秘书厅将此通知转发全国。当时，国内一些大城市的新华书店柜台上都摆放着印好并剪裁好的更改后的那两页，读者可以自己取回去对那两页进行剪贴更改。之所以要把“思想意识修养”这个标题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是因为刘少奇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已经遭到严厉批判，从而“修养”一词也成了“修正主义”的词汇，当时的说法是“越养越修”（在民间则被调侃为“越修越痒”）。被删掉的那一处文字，是原《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整顿党的作风》一文里的话：“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既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这样的文字就不宜出现在“光辉著作”里了。

另一次官方要求的对书籍文字做“技术处理”。则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并且明文载入了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的林彪“副统帅”，突然变成了“叛党叛国”的大坏蛋，要把《毛主席语录》中林彪题词手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和以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撕掉，还有的语录本中毛泽东像下边印有林彪“四个伟大”题词手迹的，也得将那手迹剪掉或涂掉。

而这一次要求各单位对文革前出版的部分书籍进行“技术处理”，涉及的书大多是儿童文学、民间文学或科技方面的。这些书籍的时事、政治性不强，但也

有一些需要按当时政治需要进行“技术处理”的地方，有的要求撕掉某页（多半是前边的前言之类，大概是作者有“问题”），有的是要求删掉书中某个段落，都是其中文字有违背文革观点或“敏感”处。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其中一本书，记忆中是一本民间故事的小册子，“技术处理”要求是：用墨笔涂掉其中一句话。这句话是：

“日头很毒。”

我当时看到这一条，就感到非常可笑。显然，虽然“林彪的极左路线”正在受到批判，但文革以来形成的那种极左思维仍然根深蒂固，那是个狂热的个人迷信时代，毛泽东被称为“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切与太阳有关的文字，都不能带有贬义。在姚文元那篇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评为“很好”并要求同一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登的《评陶铸的两本书》里，就有这样的“大批判”文字：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蓬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

所以，民间故事中提到了“日头很毒”，就必须删掉，否则就会有与陶铸一样的“恶攻”之嫌。

不知有谁能找到当年那份文件，那可是很有时代特色的历史文献。

“八搭二”、购货证与《票证歌》

现在要说起“八搭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从郊外的厂里进城回家，经过解放碑，走到邹容路与五一路交汇的路口（斜对重庆剧场的转角）处，一眼看到原在石油筑路处一起做临时工的好友武瑞明，他蹲在那里，满面愁容，满腮帮子的胡茬子也没刮，显得苍老而憔悴，其实他那时才三十出头。我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说：“等着买‘八搭二’。”我这才注意到那路口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游走着，有的在闲聊着，这个路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自发形成一个

“八搭二”交易市场。

所谓“八搭二”，就是用八角钱再搭二斤粮票，可以向农民换一斤家酿白酒。

那些年里，因为买酒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二两酒票，而那点凭票供应的酒远远无法满足酒徒的需求（一个月的酒一顿就可以报销），于是就逐渐自发形成了这种私下的白酒交易。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买卖双方就约定俗成地达成了这个“八搭二”的交易规则。当然这种交易只是半公开的，按当时的说法属于“黑市”，一旦有市场管理人员或“群专”之类来干涉，交易者就会如鸟兽散。

武瑞明浓眉大眼，形象英武。到石油筑路处做临时工前，他曾在市中区文化馆参加业余剧团演出，扮演过小歌剧《三月三》中的叛徒吴保才。我在筑路处曾与他一起在二大队大队部共事，我是宣传员，他是生活管理员，我们同住一间寝室（先是农舍后是工棚）。有一次晚上闲聊时，他曾充满向往地对我说：“三十岁以前，只要戏剧学院招生，我还要去报考。”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打断了。他那当戏剧演员的理想也成了泡影。后来他在工地上成了家，妻子是个漂亮贤淑的蓬溪姑娘。但他们都是临时工，几年后被解雇，他妻子带着小孩回了老家，而他不得不回到了重庆，在一家小厂谋到一份工作。夫妻两地分居无法解决，使他

非常苦恼焦虑，工作之余就常常借酒浇愁，因此不得不依赖“八搭二”（几年后他在抑郁中病逝）。

文革中，除了糖、烟、酒以外，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家家都有“购货证”和“号票”。我保存有一个我家的《商品购买证》（见左图），是重庆市市中区1968年底（武斗平息、

革命委员会建立、群众组织解散之后）按户下发的，灰褐色的牛皮纸封面上照例有一段“最高指示”：“……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内页的每一页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一个不同品种，分别是：毛巾、棉线、牙膏、肥皂、灯泡、火柴、打火石、酒、烟、糕点、糖果……除毛巾、烟和糕点三个品种名称是手写的外，其他品种名称都是加盖的印章（可见这些品种都是



商品供应登记表					
品种：		单位：			
编号	数量	编号	数量	编号	数量
1	1968年2月12日	10		17	
2	1968年2月12日	11		18	
3	1968年5月14日	12		19	
4		13		20	
5		14		21	
6		15		22	
7		16		23	
8				24	

先已明确要限量供应而刻制好印章或选用打字机字盘中的字丁拼成“印章”。此后有几页空白，大概是临时要增加什么品种供应时再通知加上。最后一页（封三）记载的是“五一已供”（手写，应该是1969年的“五一”节临时增供）“羊肉肆两”（手写）和“豆制品已供”（印章）。

如果没有这个小本上的记载，我怎么也想不起当年那缝补衣服用的棉线也得凭证限量购买（因受布票的限制，衣服破了都得补好了继续穿，因此棉线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小本上的记载可知，电灯泡在1968年12月、1969年2月、1969年5月供应了三次，以后就没有记载了，估计是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以发放“号票”取代了这种《购买证》。《购买证》每次要由售货员在上边手写登记或加盖“已供”的章，自然比收取号票要麻烦得多，而且不便于销售方盘点对照。

“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老百姓多年饱受票证之苦，真可谓苦不堪言。1976年春，各地民众借周恩来去世纷纷公开表示对执政者的愤懑与抗议，在北京出现大量的“天安门诗词”，在四川成都闹市区则出现了一首用大字报抄出来、人们争相围观传诵的《票证歌》（一曰《号票歌》）：

烟要票，酒要票，豆瓣豆粉也要票。
肥皂一月才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平时票证要锁好，每月买啥要记牢。
妈妈记，娃娃抄，千万不要搞混淆。
逢年过节票更多，美其名曰皇恩照。
豆腐乳，一张票，粉条猪油各一票，
缝纫机凭工业券，自行车儿要拈票。
婴儿才有白糖票，产妇才配红糖票。
这样票，那样票，就是没有选民票。
美帝反动苏联修，只有我们最最好。
继续革命开新篇，艰苦奋斗要记牢。
文化革命凯歌唱，只管拉车不吃草。

这首民谣在流传中有不同版本（这里转录的版本出自冯水木、冯至诚《长歌当哭——文革中的歌谣》，载《龙门阵》1988年第一期，总第43辑），有的版本中还有更具体的“一号票买芝麻，二号票买花椒……”，甚至有的还加进了：“邓兴国你不要跳，你晓得下个月烟票是几号？”邓兴国是当时成都的造反派头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正在那场不得人心的“批邓”运动中作最后一番折腾。

就在那些时候，官方传媒中每天都在高调宣传“到处莺歌燕舞”，组织各地

各界人士“唱红”，声嘶力竭地轮番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生逢乱世】

1977年海南农村“三同”见闻

阿 陀

小序

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我正从海南岛回到广州探亲，偶然经过市中心北京路，看到一幕场景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街上同时出现两个热点。

一边是街头摊点正在卖刚刚运到的伟大领袖逝世“号外”。人们静静地排着队，表情穆肃地一个跟一个上前付钱，然后双手接过镶了黑边的报纸……

另一边马路上有人同时在卖新到的“巴拿马草帽”。小贩的自行车后座摞叠着高高一筒软草编织的太阳帽，红蓝白绿紫五彩斑斓十分鲜艳夺目，据说是最新从巴拿马进口的（当年国家极少进口涉及民生的商品，只记得有过两次，即六十年代的“伊拉克蜜枣”、“古巴白糖”和七十年代中的朝鲜、阿尔巴尼亚香烟）。大群买草帽的市民团团围住自行车，没人排队，个个都踮起脚跟，伸手高高举钱，争相喊叫吸引卖主的注意力……

我在路边观察，被眼前强烈的反差震撼。我甚至觉得迷惑，到底哪一边才是真实的？可惜当时手上没有照相机。我朦朦胧胧感觉到，一个单色的时代将会过去，一个多色的新时代正在来临。

不久，泰戈尔散文诗在中国重新再版发行，我读到其中这一句：“我的心像黄昏的天空，对色彩怀着无限的向往。”马上就想到“巴拿马草帽”。

几个月后，我被派作为海南行政区文化系统“路线教育工作队”的一员，下放到临高县农村。三个月和农民“三同”的经历，让我有幸在中国社会转型前夜，从底层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断裂、崩塌，同时也开始了我作为一个“红旗下的蛋”的反思、蜕变和觉醒的新心路历程。

本文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真情实境和思想理念。

1月8日在“三同户”家

进村第三天，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忌日。一大早起来，我就把三同户

家的厅堂打扫干净，将带来的周总理像端端正正挂在案桌上方，即通常农村用来挂先人遗像的位置，前面撒了一些自制的白纸花，两边贴上挽联……

因为一年前总理逝世的时候上面禁止设灵堂。现在已经打倒“四人帮”，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寄托哀思，宣泄曾被压抑的感情。我想无论是工作组还是农民，都不会有人反对我这么做，因此事先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工作队的小龙跨进门槛，大吃一惊：“你这是干什么？你问过户主了吗？在农村这会犯忌的呀！”小龙是海南人，才下来没几天，我俩就成了气味相投的好朋友。他对我的鲁莽感到紧张。我顿时也有点忐忑不安，会不会闯祸了？刚好这时已经从自留地干完活回来的大妈进门了。小龙连忙用海南话向她解释。出乎我们意料，大妈完全不在意，她好像也不知道谁是“周总理”，只表示你要纪念什么国家的大官就尽管做好了。后来她那当大队“赤脚医生”的儿子起床了，穿过“灵堂”，也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当天有几拨农民先后探头探脑进来看。村里任何消息传播都是很快的，想必全村都知道工作组开设灵堂的新鲜事儿了。除了几个上过学的年轻人，大部分农民都是文盲，他们只知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大关心什么“周总理”，来访也不过是满足一下好奇心，不祭不拜，一脸漠然，和当时我那自以为挺伟大特虔诚的哀悼感情显然格格不入。我有点失落。

哀悼不成，倒是把人吸引来了，天南地北聊聊，摸摸情况也好。工作队下来，本来就要做这方面工作的。

也许因为是灵堂气氛的感染，那天大家谈的话题也提到死人——1958年公社化大办食堂之后饿死人。农民七嘴八舌说：

1958年也不是什么荒年，上面叫办公社，办食堂，当然就得办啦。

开始觉得挺不错的，食堂可以放开肚皮任吃。农民，图个什么？有饭吃就行，如果能有干饭吃，那就已经是天堂了。

结果到了1959年春天，公粮交完了，存粮也吃光了，上面也没有粮食拨下来，说断（炊）就断，吃野菜，啃树皮，村里陆陆续续死人。

附近有的村几乎死光成废墟了。这村还算死得少，也有十几个。

这家男主人就是当时饿死的。他本来很壮实，老婆和儿子后来都熬过来，他却死了。据说越是壮汉越不经饿，反而妇女还能扛一下。

……

——这是我第一次确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大跃进饿死人的事不是传闻，是真有其事！

我也第一次隐隐约约感到，我和农民对政治的认知，原来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三同户大妈和她儿子媳妇一家三口，女的都是壮劳力，儿子当村里的赤脚医

生（不下地干活，在村里属于有点地位的人，常被人请去喝小酒），这个家又还没有小孩，生活应该算不错，但一天也同样是三顿番薯粥，管饱而已。对于男主人饿死的往事，大妈不提我也不好问。但观察这家人似乎没有任何抱怨，农民是很认命的。儿子能当上医生也许让大妈多少有些安慰。村里有人发病了，夜里来拍门，儿子常不大情愿起来，大妈就帮忙催促。她很善良，也很知足。

一封“反动信件”

1977年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登基元年，基本都还萧规曹随继续毛时代的政策。我们“路线教育工作队”，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农业学大寨”。下乡第二个月，“阶级斗争”就送上门来了。

当时工作组收到一位大队小学民办教师写来的投诉信，内容是控诉农村干部横征暴敛。信上说，公社和大队干部明明知道歉收，征完公粮还要征“超产粮”，农民交不起，就开拖拉机下来抢，翻箱倒柜，把收藏的种子连同还在打谷场上晒的口粮都收了去，有不满抗拒的，就绑起来吊打……该信言辞激烈，甚至大骂有些干部就像土匪，跟国民党一样……

就凭这骂，随便定他一个攻击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罪”，五花大绑送进大牢，那是没说的。以往哪一级领导，哪一个工作组不都是这样处理？

问题是他说的偏偏是事实。

前一段时间摸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一些内情。“基本路线教育”开展早不是一天两天，农民反映，在我们下来以前，临高县一位新提拔的革委会副主任就亲自带队下公社突击征粮，做法是调来外村的干部，半夜进村搞袭击，实行“三光政策”。

还有就是几天前，一个下台的前大队长路过夜访该村，村民们瞒着工作组悄悄设酒热情接待，事后我们才听说。原来这个大队只有两万三千亩田地，学大寨运动中要求体现开荒种田的巨大成绩，公社集中各大队干部办学习班，重新报田亩，并要求这个大队报三万二千亩。大队长不干，因为多报的都是荒坡地，不产什么粮食，以后要按这土地面积交公粮和余粮农民没法活。当时不服从就会被吊起来打，其它大队干部都屈服了，就这个大队长倔，打死也不松口，最后是撤职换人了事。所以他在农民心目中是大英雄。这些事农民本来是不会对我们讲的，可能他们看见这批工作队和以往不大一样，进村后除了摸情况，组织学习，基本没做过什么特别伤害农民利益的事，对我们有一定好感。再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农民也是按捺不住啊，“三同”嘛，朝夕相处，忍不住就说出来了，言谈中还有点夸耀自家“英雄”的得意之色。

工作队内部议论，大家对前段农村政策太“左”都有同感。我们虽然都来自不同的机关单位和学校，毕竟那个年代每个人也都下过乡，多多少少有些实际生活体验，因此相信农民说的应该是实情。（我本人 1975 年曾在全省学大寨先进县海南屯昌搞“教育革命调查”，一次闲谈中公社会计就私下给我透露：上面要什么数字就给什么数字。没有一个数字是真的。）

这封信如何处理？卓蔚然组长召集开了一次会，讨论后大家一致同意，就当这个民办教师是向工作组反映情况，言论偏激一些，教育为主，不追究了。当时他反映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工作组能解决的，至于组长有没有向上汇报，那就不得而知了。大队、公社干部执行的是县里的指示，县里又执行谁的指示？工作组在适当的时候也许可以向上反映一下实情，但绝对不敢把屁股完全坐到老百姓一边。

组长曾经的渴望

工作队一共六个队员，组长卓蔚然和我是海南师专的，小龙和另一位青年女教师春花来自海南医专，副组长老彭和一位转业军人老黎属行政区科委。

我和小龙年纪相仿，又都经历过文革的动荡岁月，特别是对不久前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四五事件”有共同的认知，所以见面熟，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组长卓蔚然，女，上海人，海南师专副校长，文革前是原海南广播电台台长。她的丈夫是海南人，参加革命早，原任海南科委主任，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后受过处分。听说卓校长参加革命前是十里洋场大上海的资本家千金。一个上海小姐如何投身革命的？又怎么嫁给了一个海南的革命土包子？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身份所在，开会时卓校长也会摆一点“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架子，大道理一套套，私下里其实她还是挺“小资”的。

组长还保留一大嗜好，就是爱吃零食。农村不比城里，饭都吃不饱，还能找到什么零食？但她有办法，和她在一起，她总会变戏法似地不时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南瓜籽或是几颗炒黄豆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她从公社开会回来，请我们吃糖果——临高县当地生产的名叫“防震糖”的黑色劣质水果糖（不由你不把它和煤都唐山刚刚发生的大地震联想在一起）。

卓组长说，你们猜我文革被关押审查，在黑房里对着四面墙壁的时候，心里最想的是什么？有猜盼望自由的，有猜惦记亲人的，有猜饱餐一顿的……结果都没猜对——

她当时最渴望的就是能吃上一颗水果糖！

一个在革命年代还能公开表露真性情的人，多半不会昧着良心做事。

“共产饭”

七十年代的海南岛在食物方面有这样的特点：

四面环海——无鱼。除了沿海地区的一些农贸市场还可以见到一些小鱼小虾，全岛没有一个专门的鱼市场，各地餐馆和公共食堂也极少有海鲜供应。

气候温和——少果。在这个亚热带雨林区，无论国营商店还是农贸市场上，海南特产芒果、菠萝蜜、番石榴、榴莲、荔枝、杨桃、黄皮……任何一种都十分罕见。海口市倒是有几间水果店，偶然能见一些当地的大蕉和椰子，常年摆的主要还是北方来的烂苹果烂梨。原来这是海南铁矿石运到大连以后，轮船返程为避免空载顺道捎回的压舱货，由于当时没有冷冻设备，水果长途运输来到气候炎热的海南，十有八九都烂了。

土地肥沃——缺粮。海南岛山区植被下有沃土层，北部有火山灰层，即使是土质较差的红土坡地，因为不缺雨水，种番薯也不错。据说陈永贵副总理到海南岛视察曾经对旁人表示，这红土如果在大寨就是宝了。宝岛真是要地有地，要水有水，种啥长啥，水稻加小麦还可一年三熟。但当年海南农民常年只能靠番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七十年代前期本人在保亭、琼山、屯昌、万宁和临高各地农村都生活过，深有体会。

各地“三同”的日子里，我观察到，早上一般都是女主人先起床，把红薯干和少量一点米投入一大锅水煮开，趁着米还没煮烂煮化，舀几瓢冷水激入，粥米和薯干于是沉底。女人把锅底这些“精华”渣子捞起一些：第一瓢留给男人，以便有力气干活；第二瓢留给儿子，为了传宗接代；第三瓢倒进猪食搅拌一下，希望猪吃了快长膘好杀了卖钱；最后轮到老人和女眷……这种半稀的粥水，配几个番薯，一点咸菜，就是全家人一天三顿的主粮。每天灌一肚子红薯汤，我们短时间下去尚且饿得眼睛发绿，难为当地农民长年累月就是这么熬着。

这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可以放开肚皮大吃的聚餐。

第一次是三级干部会议后的年夜饭。那是1977年2月中旬，下乡一个半月后，农历新年快到了，工作队里没有人不想家的。就是我和小龙这样没家没口的单身汉，也觉得嘴巴早已“淡出个鸟来”，恨不得马上回城可以打打牙祭。不料上级通知下来，要移风易俗，在农村就地过“革命化春节”，我们大失所望，顿时情绪低落。县里可能主要是为了安抚工作队员，特别在除夕借口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让大家集中县里好喂一顿。那年代物资匮乏，鸡鸭鱼一概缺席，只是大米饭和猪肉煮白菜任吃管饱而已。那顿望眼欲穿的除夕大餐其实名不副实。尽管

如此，大家还是毫无怨言，人人都撑得心满意足走不动路，只是有些农村基层干部抢饭抢肉太多吃不完，撒得桌面上水槽里到处都是，让人心痛。

第二次是公社“学大寨动员大会”后的“共产饭”。平时生产队晚上开个会，社员就算每家派个代表都拖拖拉拉爱来不来，现在要动员人人远道跋涉到公社去，怎么可能？我犯愁和生产队长商量。他说：根本不用动员，到时候人人都会去，你就放心好了！

果然，开会那天全村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聋的、哑的、撇的、拐的……只要有口的，几乎百分之百出席。所谓“社员大会”，就是各村一堆堆人分别聚在公社小镇的一棵棵大榕树下听广播。小孩吵大人叫，闹哄哄的谁也听不清喇叭里在说什么。可是每个人都显得特别亢奋，个个笑逐颜开，会场弥漫着一种节日气氛。这是为什么？我好生纳闷。

中午饭的时候，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今天是吃“共产饭”——从生产队的集体存粮中拿出米来，凡参加开会的人都可以放开肚皮任吃管饱。队长和会计事先已经把带来的米和在市场上买来的萝卜交托镇上相熟的人家操办（事后付一些米作报酬）。大会一散，急不可耐的“饥民”人人连跑带冲奔向吃饭地点。不管大人小孩，每人都可以分到一勺白水煮萝卜，白米饭则自己任舀。于是个个狼吞虎咽，吃在碗里盯住锅里，生怕不够添的，每个人都添了一次又一次，菜吃完了就光吃白饭也行。母亲一面自己拼命撑，一面匆匆往手上抱的娃娃嘴里塞，弄得孩子满脸饭粒……最后，所有人都翻起了幸福的白眼，气喘如牛，瘫着不愿动。这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才算圆满落幕。

“烽火戏诸侯”

1977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毛泽东刚去世不久，他夫人为首的“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这消息公布时，全国到处都有庆祝游行。当时我从江门出差回海南旅途中，长途汽车在粤西大地一路不时遇到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我发现这次游行和以往很不一样，虽然有点乱糟糟的，但人们都比较兴奋，感觉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激动。这和我个人当时的思想状况也比较吻合。一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什么“四人帮”不“四人帮”，只是持续多年的极左的现行政策不得人心，这政策的代表人物垮台了，人们自然高兴。希望政策能有所改变是人心所向。但改变谈何容易？我们这工作组不一样要下来搞阶级斗争，抓学大寨？

上面布置下来，要掀起一个大开荒，大积肥的学大寨新高潮，到时公社会集中各大队干部和工作队领导一起巡回检查验收。

到了验收那一天，我随着生产队长带全村劳动力来到公路边不远的一片荒坡

地，队长在远处先插上几杆彩旗，然后布置大家用锄头刨草皮堆起来准备烧。这薄薄一层被烈日晒得半枯焦的草皮，原来还多少可以起点水土保持的作用，现在刨起来，目的是烧成草木灰，这不但破坏土地，那点草木灰也没有多大肥效，完全是得不偿失。

不久，远远传来拖拉机突突响声，队长立刻命令点火，顿时不光我们这个山坡，四面八方到处都出现滚滚狼烟，再加上旌旗猎猎，那一长串手扶拖拉机穿行乡村公路上，不知道乘坐上面的检阅者们是不是觉得颇为壮观。反正我觉得特别滑稽，整整一个现代版的“烽火戏诸侯”。车队过后，队长马上下令灭火，宣布收工。社员一反来时懒洋洋的拖步，人人都急急赶回家，忙自己的自留地去了。

积肥运动第二步是当天晚上生产队召开大会，要求每家每户必须连夜清理自家的灶头猪圈，把草木灰和圈肥挑到晒谷场集中堆放。我也以身作则，从三同户家的灶头掏了两簸箕草灰挑到晒场，结果发现社员们挑来的多是旧房基土什么的，好肥恐怕都留给自留地了。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不好说什么。

又过了半个月，明明春寒未尽，上面却布置今年学大寨要破除迷信，提早育秧，村里迟迟按兵不动，我便问队长要了一点稻种，自己播了床铺大的一小块试验田，还把原来那挑草木灰拨出来，挑到田头做底肥。生灰加严寒，结果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的年代，工作组能够不干什么坏事，无为而治，已是功德无量，我居然还自己糊弄自己。现在想来，也不知道当时那个书呆子是真傻还是假傻，反正傻是吧？

一块面饼

几个月下来，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干过，只是好事不一定有好效果。

一天夜里，一个社员哭丧着脸找上门来，说死了什么什么的。我海南话不大灵光，当地语言更难明白，还以为他家出什么事，死了人。弄了半天才知道他家的大猪突然发急病死了。我知道农民是不可以随便杀猪卖肉的，起码要经过公社防疫站检验批准，至于还要不要其他手续，纳不纳税就不大清楚了。现在这个农民如丧考妣，显然是知道过不了公社检查这一关，求我帮忙来了。这个生产队很穷，解决基本口粮都困难，年底更无钱可分。养大一头猪就是一家人全年的指望。可是就算同情他，我一个普通工作队员，又能做什么？

先去看看再说。毕竟我原来在兵团养过三年猪，兽医短训班里也学过几下三脚猫的功夫。我先检查猪头，两眼没发红，不见脓性分泌物，鼻头也没出血点；再翻猪身，皮下不见出血点；最后检查排泄物，也没有拉稀，可以首先否定猪瘟。

再看看身上没有“打火印”（疹块），也不像是猪丹毒。把这两种最危险的传染病排除，我就有点放心了。想起公社兽医是广州老乡，开会时有一面之交，我就写了个便条让带去找他，大意是告知我的判断，希望他验证处理。虽然没有直接求情也等于请他关照了。果然他很给面子，社员高高兴兴卖了肉回来，还留下一些，晚上请我过去喝酒。我谢绝了，不敢去，因为我不知道猪到底是怎么死的，可自己当初又怎么会帮他卖死猪呢？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这时才后怕。真是年轻冲动，太欠考虑！我意识到此事办得滥。

还有一事是给五保户挑水。

虽说“三同”——同吃、同住，后面还有个“同劳动”，其实工作队一般很少下田劳动。不开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驻守村里，也是很无聊的。闲着也是闲着，有天心血来潮，我想不如帮“五保户”挑挑水？（文革前学校下乡农忙，我们也常会帮农民挑挑水。）了解一下，本村有五、六户孤寡老人，其中一户还是烈属，据说户主的儿子原来在本县军用机场当兵，一次油库着火时因救火牺牲了。我于是一有空就去给这家人把水缸挑满。几天下来，全村都知道这事了，各种议论很快传回我的耳朵，说稀奇说好的固然有，批评反对的也很莫名其妙。因为这家是烈属，享受政府一点非常有限的补贴，村里有人已经眼红妒忌了，有的五保户觉得自己更困难，工作队为什么不给我挑水？更有人“揭发”：老太婆不是烈士的生母，只是老头的续弦而已，是图老头的烈士家属身份才嫁过来的，这人本是地主婆……

好在已不是“四人帮”得势的年代，我胆子也大了，反正本人非党人士，不指望仕途发达，无欲无求，想做就做，流言权当耳边风，我还是我行我素。

三个月的下放即将结束。临别那天晚上，晚饭后都九、十点了，老俩口叫人把我请去。进门坐下后，老头拉绳放下一个高高吊在屋梁上的小竹篮，抖抖索索从里面摸出拳头大一块不知放了多少年，已经发干发糠的黄色碱水面饼，连同拇指大的一块腌肉，交给老太婆给我做一碗面……

在三同户家，我已经吃过饭，喝过送行酒了，但此时此刻，老人倾其所有为我践行，我无法拒绝，这碗面的分量太重了。

四十多年过去，老两口的容貌早已荡然无存，但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都会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碗面，不会忘记那片养育我的故土和人民。

2014年7月25日三稿于芝加哥

【生逢乱世】

我们的父辈：一个家庭的 1966~1976 日常生活史

黄章晋

按：本篇原载“大象公会”网（2013 年 12 月 14 日下载）。原编者加有如下按语——

今天，我们与您分享黄章晋先生为父母整理的“1966-1976 年日常生活史资料”。每一个人和他们的时代都值得记录。微观的故事汇集起来，展现出的将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全貌。大象公会期待您也来讲述父辈的故事。

活动方式：

1. 欢迎大家参考这篇文章所采用的“生活史”形制，撰文。发信到 letters@idaxiang.org
2. 我们将汇总整理您的来函。您父辈的故事将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一生中的青春岁月会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如果想匿名或不愿公开分享，可注明。我们会为您保管资料）
3. 感谢每一个讲述者，您和您的父母都会被邀请参加大象公会组织的分享活动。

可能没有人像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样，与父辈有着如此深的观念鸿沟，两代人不但彼此无法理解，我们还会觉得父辈的行为、习惯与时代严重脱节，甚至格格不入。近来公共话题中，“老人”成为关键词，或许是一个旁证。

我的父母年届七十，尝试用沟通弥合两代人的观念鸿沟总是自找痛苦。而最有意义的行动，或许是尽可能了解塑造他们精神和行为习惯的那个年代。这样，当两代人发生观念摩擦碰撞，在静下心的时候，能同情地理解他们。

好在我父母有非常好的记忆和记录习惯。他们能最大程度地用数字和细节还原曾经的生活，使得写就此文并不困难，并让我对那个年代的了解不止于宏大叙事。

我愿意分享我父母整理的日常生活史料，虽然从 1966-1976 的十年只是他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但在我看来，这段充满政治运动以及人为导致的严重物质匮乏的时光、同时也是参加工作的头十年，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比其他时段更为强烈。

当时所在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家庭成员：父母与我，共三人

货币收入

兵团属 12 类地区，工资标准较高，从 60 年代进新疆基本工资便是每月 28 元，加上 30% 的高寒补贴、边疆补助以及菜金补贴，夫妇每人月收入为 36.92 元，1972 年 7 月后工资又调高了 5 元（之前已十多年没有调过工资）。工资非按月发放，一般为每季发放一次或半年发放一次，一般人口较多家庭或只有丈夫拿工资的家庭都会为单位挂账。

1974 年后，我家每半年要往内地经济条件较差的亲戚家寄 5-10 元钱，同时还寄送内地短缺的衣服、布料等物品。

食

当时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 40 斤，无职工身份的家属每月 28 斤粮，未成年人每月粮食按照年龄分别为 5 斤、8 斤、12 斤……递增。口粮构成：玉米面 70%、白面 30%，大米从未供应过。

食用油：

为农场自己榨的棉籽油，职工每人一个月半斤。

肉：

肉价为 3、4 角钱一市斤，但平时无肉可吃，只在春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农场会屠宰牲畜，职工每人可买 1 公斤肉（春节可买 2 公斤）。另外，冬季每个职工可分得 2 公斤羊肉。

蔬菜：

因农场土地广大，秋末霜降时，每家均可分得大量白菜、土豆、红薯等过冬蔬菜。但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及女方未解决职工身份的家庭，会面临温饱问题。虽然家庭人均收入不足 8 元/每月的家庭，单位可在提出申请后照顾多发部分粮食。但一般人口较多的家庭，即使有粮食补助，仍需要春摘榆钱、夏采马齿苋或到单位饲料地里偷苜蓿叶、冬天在单位菜窖外争抢被扔出来的烂白菜叶，惟有秋季食物来源相对丰富。

糖：

白砂糖只在几十公里外团部的供销社有售，但必须因病凭卫生院证明购买，白砂糖每人每次只准买 200 克。1973 年后，兵团自己的糖厂能生产水果糖，过节时允许职工按每职工 1 斤的定量购买。兵团自产的水果糖品质明显区别于上海或内地生产的水果糖，入口后溶解速度不均，常有木棍、沙子、活性炭等颗粒物，故被称为黑糖。尽管如此，每逢黑糖到货，连队商店门口照样会排上长长的队伍。

衣

1970 年前一段时间，每个职工只发一尺 5 寸布票，而一条短裤需要三尺布票，夫妻两人的布票刚够做一条短裤。所以人们开玩笑说，两口子穿一条短裤。因 1967-1969 年间丝线大量用于绣毛主席宝像和各种宣传器具的装饰品，很长一段时间，连缝补衣服的线在商店里都买不到。

1970 年后，纺织品短缺现象开始缓解，布票每个职工能分得 2.5 米。但上自连长下到普通家属，无一例外在衣领、膝盖、屁股、肘部、袖口缀满补丁。孩子的衣裤多是由父母穿烂的衣服拆开后重新拼凑成。当时的布往往粗厚，所以不少妇女会买几条 2 角钱一块的手帕拼成内衣穿。

兵团产羊毛，每个家庭都掌握了自己将羊毛捻成毛线，再将毛线染色的技术，织毛衣的技术最早由上海籍职工向周围传授，织毛衣一般选在晚上单位召开漫长会的时候。

1975 年，来自上海的职工回上海探亲后，第一次带回了涤卡、的确良等全新的布料。每有上海职工探亲回来，其家必观者如堵，并响起一片羡慕之声。上海籍职工探亲都肩负着帮邻居购买交换紧缺生活物资的任务。完成任务复杂周折，需要把新疆的全国票证在黑市兑换为上海的工业券，有了工业券才可买回新疆紧缺的日用品。当时，顶针、松紧带、穿鞋带的扣眼、衣裤用的暗扣、彩色塑料线、各种花布、缝纫机线等等都需要由上海籍职工采购。

住

1973 年春以前，全家住在 10 平方米的地窝子。地窝子是在地面挖出的方形深坑，形如地窖，挖出一个两米左右倾斜的坡道即为门，上覆以拱形的顶，屋顶上开一口镶上玻璃，即为取光处。当时住房极缺，年轻职工成家都住地窝子。冬季地窝子保暖性尚可，新疆少雨，通常住地窝子并无麻烦，若有大雨则苦不堪言。

1973 年后，搬进地面的平房，面积 12 平米。当时无论人口多少，哪怕全家三代同堂有接近 10 口人，每家分得的住房也大小一样。当地住房如军营般整齐划一，每排平房前是划出地，允许职工自建杂货棚，以做储物养鸡鸭之用。

用

1966-1970 年为物资极端匮乏期，几乎所有日用品告罄，不但牙膏、牙刷、洗涤用品短缺，因大量纸张被用于大字报、传单，故连纸张也短缺到只能用废报纸写信。学生无作业本，老师鼓励学生把铅笔写过的作业本擦净后再用。高年级

学生流行一种特殊的作业本代用品：在深色硬纸版上涂抹凡士林，上覆一张油纸，用硬物在上面写字，写完后，把油纸一揭，字迹消失。

黑肥皂：因为肥皂、洗衣粉等物资极匮乏，人们先用皂角洗衣，后来用加工厂排污口附近富含油脂的泥土加入碱性物质混合煮熬成土肥皂。每年夏季，职工家家户户煮熬土肥皂。此肥皂内部疏松多孔，分量极轻，呈深黑褐色，用力涂抹在衣服上会留下棕褐色的印记。

改良漆：1972 年之前，大部分新建家庭无任何家具，床是单位提供的两条长凳搭上 8 元钱卖给职工的 8 块床板拼成，饭桌是单位木工业余时间帮忙打出来的。随着职工逐渐有业余时间精力忙自己的生活，各家庭开始添置衣柜、写字台、靠椅之类家具。这时商店里及时出现了一种叫做改良漆的油漆。产地不详，全是一种颜色，刚涂上去，呈明亮的深棕红，不久颜色逐渐黯淡，最后远看是黑色。

1976 年以前，大部分连队未通电，靠煤油灯照明，每月供应半斤煤油。所幸当时下班吃完饭后永远要开上好几小时的会，可以节省灯油。除煤油灯外，家里还有虎头牌电筒一支。

1975 年，我家终于添置了 140 元的飞鸽牌自行车，1976 年，增设一台需用 6 节电池的春蕾牌收音机，但“三大件”中最贵重的缝纫机始终未能如愿添置。

日常生活

大礼拜：

直到 1980 年以后，兵团当地的休息日才与内地一致。当时兵团搞的是 10 天休 1 天，俗称“大礼拜”，而学生则是 7 天一礼拜，孩子与父母的放假休息时间很难凑齐。

开门红：

当时法定假期是春节三天，五一、国庆各一天。但 1972 年以前，经常春节不放假休息。1969 年大年初一搞“大战开门红”，天不亮职工就下到地里挖土，当时酷寒，漫天大雪，对面看不见人，地硬如铁，人人心里愤怒，但无人敢做声。因天气冷，围在脸上的口罩和围巾被呼出的气冻在脸上揭不下来。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始于 1966 年冬，止于 1970 年冬。

清早职工列队下地劳动。领头三人，一人扛贴有主席像的牌子走在最前，紧跟两人各扛一语录牌。下地后三块牌子插在最前面，领导带领职工列队面朝三块牌子站定，先带领大家齐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万寿无疆。礼毕，向主席像汇报当日工作任务安排，语含征求伟大领袖准许安排之意。报毕，干活。晚上

收工后，大家又在领导带领下齐聚在三块牌子前，照例先敬祝万寿无疆，后由领导汇报总结当日工作。报毕，职工依次上前向牌子低头鞠躬汇报，一般多陈述自己工作有何不理想的地方，再找身体不舒服，遂意志薄弱之类的客观原因，最后请罪并表示下次将改过等等。报毕，收工回家吃饭。

开会：

农场职工几乎没有个人业余时间，晚上吃完饭照例要回单位开会，会议分大小。

小会是班组找一间房，大家带着板凳围坐马灯前，先由班组负责人念报纸或文件，或大家依次朗诵各自写出来的工作汇报或批判稿，最后轮流政治表态批评、汇报个人思想动态。一般不少于三个小时。大会则是领导发言，下面群众听。任何一个单位的中心都有一个大会议室。1972年以前，批斗大会很多，经常有事先安排好的示众和打人。之后批斗渐少，主要传达冗长无趣的上级指示，会议纪律也随之涣散。讲说者如果口才差，下面群众定开起“小会”，夹杂孩子的打闹哭泣。开会时的大会议堂是职工私下交流传播各种消息的最重要场所。

婚葬宴请：

婚礼一般选在五和十一。通常晚上连队开完会后，领导要大家不要走，指导员宣布，今天某某同志与某某同志结婚，祝小两口努力学毛著，争当一对红。祝福毕，指导员令全体起立合唱谱曲后的《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歌毕，令新婚夫妇背几首语录，各自独唱几首革命歌曲。随后，夫妇拿出准备好的烟、葵花子给大家。葵花是连队自种的，0.15元每公斤，烟是写报告批准买的雪莲烟，0.08元一包。1973年，农场出现自酿白酒，婚礼是能喝到它的少数场合。

职工去世，连队会开追悼会，送棺材一口、挽联一幅、花圈一个。追悼会选在工余时间，指导员简单总结死者各种贡献后，带领大家背诵“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后即告完毕。1975年之前，很少有亲属佩戴黑纱。而哀乐是领导人去世才有资格播放，故平民追悼会安静匆忙。

1974年后，零星出现职工私下的宴请，主要目的是求领导或同事帮忙。求领导的事项从请假探亲、调换岗位、批条子买鸡蛋、住院、开药到推荐子女当兵等等，日常生活无所不包，求同事，则主要是希望结成“同伙”，在业余时间利用单位的便利干私活。

人际与社会关系

职工认老乡之风盛行，邻居之间喜欢互相帮忙，经常亲如一家。由于物资极

为匮乏，日常生活必须互相帮忙，只要掌握居家有关手艺，业余时间会特别忙，也特别受人欢迎，生活水平也相对较好。

但人们对相互信任极有保留。1972 年之前，互相检举揭发之风盛行，揭发邻居用印有领袖头像的废报纸上厕所之类事情常发生。随着批斗减少，熟人邻居才敢一起到单位饲料地去偷苜蓿。

出身较好的人敢私下发牢骚、讲怪话，出身不好的人则夹着尾巴，谨小慎言。对当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出身好的职工因其此前管理残暴，多会痛打落水狗，而出身不好的人往往会转而同情以前迫害他们的人。

文革末，职工已疲于阶级斗争，“沾公家便宜”现象逐渐普遍，尤其在工厂单位，不但小偷小摸常见，利用单位设备材料干私活现象也半公开化。当时各种吃拿卡要已经蔓延。农业连队冬季大修农业设备，机修单位的工人师傅常会索取鸡蛋等物，不然会以种种借口无限期拖延。

连长、指导员有很高权威，他们不但能直接把职工送进劳改队，而且连队本身就有临时管制职工的权力。虽然领导与职工几无收入差别，也很难有钱物的腐败，但特权依然存在，比如，农场通常只有领导和医生的孩子才有机会得到抗菌药物，长一口黑色的四环素牙（四环素牙又称染色牙，是儿童在牙齿发育钙化基期服用了四环素类药物，造成牙齿硬组织的矿化抑制，表现为牙齿变色或釉质发育不全，使牙齿呈黄色、灰色或灰黑色）。

领导有随意拆开职工私信的权力，大家彼此之间没有隐私。有指导员和连长关系长期不和，指导员通过拆信，成功掌握连长与外单位女知青“乱搞男女关系”的铁证，将连长送进监狱。

我的父母整理提供的日常生活史资料，就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

他们曾青春焕发，朝气蓬勃，满怀理想，像我们今天一样。年复一年，同志逝去，希望破灭，青春的迷人国度变得更加遥远，生活之路变得越发使人厌倦；尘世的负担不断增加，直到辛劳和苦痛变得沉重得几乎无法忍受……一切的美好都在凋谢，犹如沟壑般的皱纹最终爬满脸庞。

这就是我们的父辈。

【编读往来】

读者对 40 期启之专辑的感想

柳彦杰信中说：读到这期启之专辑，《内蒙文革第一枪》是他《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一书中的摘录，该书更多的篇幅是记叙当年

内蒙那场血雨腥风的“挖肃”运动，资料十分丰富。此书在国内难于出版的命运，让人联想到另一件事：日本静岗大学的一位教授，因为长期从事内蒙文革的资料整理，还得了个“司马辽奖”。我是听日本大阪的一个朋友说的。

国庆信中说：我赞成启之在与纽约时报中文网对话中说的，现在的一些公知也是喝狼奶长大的，也有一个吐尽狼奶、开口奶的问题。但是，他们跟宋彬彬不同，第一，他们是搞人文历史的，宋是搞地质科研的；第二，他们是自由派的知名人物，而宋只是一个领取美国政府退休金的华人雇员。这么说来，公知的专业 and 思想派别就要求他们应该比宋彬彬对狼奶教育有更深入的反思。

晓星信中说：“启之专辑”中，《毛时代的人民电影》后记，文虽不长，却文采斐然，意味深长，我反复诵读，十分欣赏。文中推崇的明清之际与新王朝保持距离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也正是我所敬仰的。作为知识分子，可以有立场、观点的不同，但总要有一点“风骨”；不见得都要去抨击现实，但至少要不与权势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很难有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